臺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
2006 年 6 月，頁 145~216

BIBLID1012-8514(2006)37p.145-216
2006.1.12收稿，2006.5.2通過刊登

江山如此多嬌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

沈　松　僑**

提　要

一般而言，國族的建構有其明顯的空間面向。國族認同通常都與一塊邊界明確的地理疆域緊密相聯，國族成員也是藉由對此國族疆域的分享，而相互凝聚為一整體。本文便是透過對1930年代大量西北旅行書寫的文本分析，探討近代中國國族疆域的想像過程。

1930年代，中國面臨外敵交侵的深重危機，開發西北、鞏固邊防的呼聲應運而生。許多來自內地大都會的知識分子，便是在「救亡圖存」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激勵下，深入中國西北地區考察遊歷。這些旅行者，利用一套「自然國族化」的領域性技藝，把西北這塊長期位於華夏世界之邊緣，族群、文化極其繁複多樣的廣大地域，形塑成為中國國族「地理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們所書寫的旅行記述中，西北地區一方面被表述為中華民族發祥起源，孕育中國國族獨特精神與本真價值的「家園」；同時，西北地區的特殊地景也被納入一套國族化的歷史敘述，被再現為銘刻著國族記憶的「神話地景」。經由這樣的論述策略，西北遂從一塊物質性的地理空間，轉化而為中國國族成員共同感情與集體認同所寄寓的象徵空間。

不過，西北地區國族疆域化的過程，同時卻也是一個內部殖民的過程。在以漢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旅行書寫中，西北地區的異質人群與文化，雖然被整編納入一個同質、連續的國族共同體之內，卻又只能是國族教化、規訓的客體。1930年代西北旅行書寫所想像出的中國國族，究其實質，依然只是一個披著國族外衣的帝國。

關鍵詞：近代中國　國族想像　國族疆域　旅行書寫　西北地區

---

* 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 91-2411-H-001-074）成果。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二、「美麗新世界？」：開發西北聲中的西北旅行書寫
三、吾土吾民：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疆域的建構
四、國族內部的「他者」：西北旅行書寫中的邊疆民族
五、結語

一、前言

1875 年，當瑞士國內正為如何建構一套穩固的國族認同，陷入一場聚訟紛紜、擾攘不安的激烈論爭之際，曾經對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伯倫知理（Johann-K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特別撰文指陳疆域（territory）與國族建構之間的密切關係：

> 如果說瑞士人擁有特殊的民族性，那麼這種感覺必然是來自他們美麗的家園（homeland）。……瑞士之外固然也有著高山大川、浩瀚汪洋，然而，唯有瑞士人的家園才能構成如此一個圓融完整、多彩多姿的自然整體，從而在她的土地上逐漸發展出一種共同家園的特殊感覺。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即使散居不同的山谷、說著不同的語言，這種感覺卻能使他們作為同一父祖之國（fatherland）的子孫，而凝聚起來。[1]

伯倫知理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作為一種地理空間的疆域在形塑國族認同上的重要作用。事實上，當十九世紀後半，關於國族的文化想像在歐洲開始出現時，疆域即已被視為國族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對德國國族主義運動的先驅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而言，國

1 Johann-Kaspar Bluntschli, *Die schweizerische Nationalität* (Zurich: Rascher und Cie, 1875), 11; cited from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Alpine Land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wiss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Oct. 1998, London), 651.

族正是人民與其疆域之間緊密連結的自然產物。[2]許多研究國族與國族主義的學者，在界定國族的意義時，也都會把疆域當作國族構成的重要環節。Montserrat Guibernau 便認為，所謂國族，乃是「一個人群，他們自覺地形成一個社群，附著於一塊明確區隔的疆域，有著共同的過去與對未來的共同計畫，並宣稱其擁有自治自理的權利」。[3]Guntram Herb 甚至強調，疆域安頓（situate）了國族，賦予其穩固的根基與明確的邊界；如果沒有一塊特定的疆域或家園，國族便無從想像。[4]由此側面而論，國族，正如地理學者 David Storey 所言，是一個疆域的概念，國族主義也正是一套有關疆域的意識形態。[5]

疆域對於國族之所以重要，固然有其現實的政治、經濟功能。眾所週知，現代國族國家需要一塊界線明確、相互毗連的疆土，來界定其遂行正當統治權力的範圍。同時，疆域作為一塊由土壤、空氣與水分所構成的實體物理空間，也為國族成員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資源——一種 Jan Penrose 所謂之空間潛在的物質力量。[6]

不過，上舉伯倫知理與赫德兩人所著重的，顯然是與此有別的另一面向。相較於其物質力量，疆域更為重要的作用，實繫之於其所能掌握與動員之潛在的感情力量。現代國族國家與前現代的帝國，同樣都建立於特定的地理空間之上，但是，如 Perry Anderson 所指出者，遲至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依然來自王朝傳承的原則，而非疆域的觀念。[7]王朝奄有的土宇，只是統治者一家一姓的私產，

2 Jan Penrose, “Nations, States and Homelands: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Nationalist Though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8:3 (2002, Cambridge), 286.

3 Montserrat Guibernau, *Nationalisms: The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100.

4 Guntram H. Herb, “National Identity and Territory,” in Guntram H. Herb and David H. Kaplan eds.,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erritory, and Sca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17.

5 David Storey, *Territory: The Claiming of Spac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65.

6 Jan Penrose, “Nations, States and Homelands: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Nationalist Thought,” 278-279.

7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39.

而非國族成員所共享的神聖疆域；其所統攝的，只是由無數具有高度歧異性的社會、文化單元所構成的異質空間。[8]反之，近代意義的國族疆域則是經由國族成員在感情、經驗、記憶、意圖與欲望上的深切投注，從抽象而開放的「空間」，被轉換成封閉而具同質性的「地方」（place），並成為個人與集體認同的一項重要標誌。[9]

用地理學者 Robert Sack 的論點來看，這種轉換，是透過「領域性」（territoriality）的地理策略，被建構出來的社會產物。Sack 所謂的「領域性」指的是：個人或群體藉由區劃並宰制一塊被稱作「疆域」的地理區塊，來對人們、現象與關係，遂行其影響與控制。它是一種創造並維持特定地理脈絡的機制，我們便是透過這些脈絡來體驗世界，並賦予其意義。[10]就此而言，國族打造過程中的一項核心問題，乃是如何有效動員特定的領域性策略，俾將物質性地理環境，轉化而為國族的象徵性空間（symbolic space）。一如研究國族主義的知名學者 Hans Kohn 所言，我們對「家園」的摯愛，並不是一種「天生自然」的現象，而是歷史與思想發展的人為產物。正是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才要求我們「認同於那些數以百萬計，而且我們永遠不會熟識的人們的生活與期望；認同於一塊我們或許永遠不可能全部親身踐履的疆域」。[11]

---

8 一個明顯的例證，便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鄂圖曼帝國實施 *millet* 制，帝國內部分成許多由不同宗教組成的社群，各自有其不同的法律系統。參見 Steven Grosby,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2 (1995, Cambridge), 145.

9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276. 關於「空間」與「地方」的分殊，參看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49；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133~158。

10 Robert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 219. Sack 對疆域的看法，顯然偏向建構論的立場，至於主張根基論的學者，則往往將人類的領域性現象視為一種「本能」，如 Steven Grosby 便認為領域性是現代社會一種根基性、超越性的特質。參見 Steven Grosby,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11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The

一般而言，國族主義者最為習見的領域性策略，便是挪用人與土地之間根基性紐帶（primordial attachment）的隱喻，將國族的神話式歷史與其疆域緊密地連結起來。Jessica Evans 認為，國族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12]其與宗教社群等前現代共同體最大的區別，端在於其獨特的想像方式：現代國族國家想像其人民是被繫結在同一塊疆域之上；經由這種想像，國族變成「一塊已被歷史化之疆域的佔居者，也是一個已被疆域化之歷史的主體」。[13]Anthony D. Smith 則將此一想像過程，稱作「記憶的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memory）。他強調，任何國族都必須訴諸歷史性的地理，作為支撐其存在的有力理據。他們因偶然機緣而佔居的領土，必須被轉換成歷史的必然，土地本身也必須變成一個列祖列宗世代相傳的「家園」。在這塊「歷史的土地」上，土地與人民交互影響，彼此形塑，綿延無數世代。「家園」則成為國族群體歷史記憶的貯存所，一塊「我們的」先聖先賢、英雄豪傑生活於斯、勞動於斯、祈禱於斯、戰鬥於斯的「詩意空間」（poetic space）。藉由這樣的想像與論述，「自然」本身遭到國族化，特定的地理特色與地景，成為國族歌頌仰慕的對象；而國族共同體及其歷史，也在同一過程中被「自然化」，它的發展，被視為自然秩序天經地義的一部分。唯有如此，國族的土地與地景，才能激發人民大眾的認同效忠與大規模的犧牲奉獻；群體內部原本多元歧異的人口，也才能被融鑄成為一個「國族」。[14]Walker Connor 更特別指出，在「家園」的隱喻中，透過「血與土」（Blut und Boden）的強大結合，國族的疆域與「祖先」、「家庭」等根基性信念糾結混融，

Macmillan Company, 1946), 8.

1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revised edition, 1991).

13 Jessica Evans, "Introduction: N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David Borwell and Jessica Evans eds.,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2; 引文見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41.

14 Anthony D.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1,159;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9-10.

被當作是國族群體的文化坩鍋與地理搖籃，從而催發其群體成員無比強烈的感情力量。[15]在這種論述策略的形塑下，國族疆域所指稱的，已不僅僅是一塊土地實體，同時也是國族共同體成員於其內為共同目標團結奮鬥的文化空間；更是一個賦予特定價值與意義，維繫群體凝聚與成員歸屬的「根源隱喻」（root metaphor）。[16]這也正是何以所有現代國族國家莫不將其領土視為不容分割、不可侵犯之神聖事物的緣由。[17]

從許多不同知識門類與文化實踐，我們都可以發現國族主義領域性策略運作的痕跡。最突出的例證，當然是以空間為主要探討對象的地理學。自其於 1870 年後陸續在歐洲各大學取得正式學科的合法地位伊始，地理學便與各國的國族主義計畫糾結纏繞，構成一套相互支撐的緊密共生關係。新興的地理學者在闡述這門新學科的思考架構時，幾乎無一可免地陷入其對自身母國之特殊關懷與偏愛所交織而成的網絡之中；他們甚至將界定本國的國族認同，並賦予其堅實豐厚的實質內涵，視作個人別無旁貸的神聖職責。[18]

除了地理學這類嚴肅的學院知識之外，繪畫、音樂與地圖等不同文

15 Walker Connor, “Homelands in a World of States,”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eds.,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53.

16 Dipankar Gupta, *Culture, Space and the Nation-State: From Sentiment to Structur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20-121.

17 以近代中國為例，1919 年五四運動期間，羅家倫為遊行學生所擬的著名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便充分流露出這樣的感情與意識。

18 關於地理學與國族建構的關係，參見 Davi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 Charles Withers 曾以蘇格蘭為個案，探討地理知識如何被用來形塑時人對國族的理解，見 Charles W. J. Withers,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cotland since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在這方面，近代中國也不例外，1909 年凌廷輝於所編新式地理教科書中，便是以國族主義的領域性論述，來證成地理學知識的重要，他說：「嗟我中土，山河之美，卓絕全球，……尺土寸壤，皆先王先公之所經營，踐土食毛，正我子孫所當圖報。欲折歐美之狡謀，而醒吾民之睡夢，不明地理，何所憑依？是欲發達我國國民之國家思想者，當發達我國國民之地理知識也」。見凌廷輝，《人生地理學．總論》（上海：新學會社，1909），引見郭双林，《西

化形式對國族疆域的再現，也都從各個不同側面，對國族的建構，發揮了推波助瀾的強化作用。[19]這些不同類型的「文化銘刻」（cultural inscriptions）所產生的效應，使得「國族」此一想像的產物，得以在日常生活與日用語言中，化為幾可觸摸的具體存在。[20]以繪畫而言，Stephen Daniel 討論過英、美兩國畫家以其特殊風格描繪本國地景之風景畫，所形塑出的獨特國族認同。[21]在音樂上，十九世紀捷克作曲家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 1824~1884）所譜寫的交響詩組曲《我的祖國》，對捷克國族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也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著名事例。至於地圖在建構國族上的重要作用，更是相關學者極為注意的焦點。Liisa Malkki 便曾探究過現代國族國家中，人民與疆域之間的認同關係是怎樣透過地圖的視覺技術，而被創造出來，並被自然化。[22]Thongchai Winichakul 也對近代泰國在由一個僅具模糊邊疆（frontier）、內部充斥著階序性（hierarchical）異質空間的傳統王朝，轉化為一個擁有明確邊界（boundary）、並具高度同質性的現代「地理體」（geo-body）的國族打造過程中，西方的現代地圖繪製技術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有過十分詳盡的論述。[23]

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82。

19 Guntram H. Herb, “National Identity and Territory,” 48.

20 Ana Maria Alonso, “The Politics of Space, Time and Substance: State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1994, Palo Alto), 381-382.

21 Stephen Daniel,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 Liisa H. Malkki,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in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4-56.

23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assim*, esp. 113-127. Benedict Anderson 於 1991 年修訂的 *Imagined Communities* 一書中，也特闢專章討論人口普查、地圖與博物館在形塑國族想像上的重要作用。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ised edition, 1991), chapter 10.

由於篇幅與個人學力的限制，本文當然無法對以上所述各類文化實踐所蘊涵的領域性策略，及其在近代中國國族想像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應，進行全面的分析與檢討，而只能選取一批特殊的文本——1930 年代大量出現，以西北地區為敘事對象的旅行書寫，來對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此一重要面向，從事初步的探索。

近年來，關於旅行與旅行書寫的研究，漸次風行，蔚為學界矚目的新興課題。不過，西方學者的相關論著，大抵深受 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典範的影響，主要是在後殖民論述的理論脈絡中，探究西方人到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從事旅行探險及書寫的過程中，如何藉由對非西方「他者」的特定再現策略與敘事模式，回過頭來建構並鞏固西方世界自身的帝國認同、殖民霸權與性別差異，[24] 鮮少有涉及國內旅行與國族想像之關係者。[25]至若研究近代中國族群現

24 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Dennis Porter, *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mes Duncan and Derek Gregory eds., *Writes of Passage: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Steve Clark 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London: Zed Books, 1992)等書；以性別差異與殖民關係為討論焦點的，有 Sara Mills, *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Inderpal Grewal, *Home and Harem: Nation, Gender, Empire, and the Cultures of Trave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eryl McEwan, *Gender, Geography and Empire: Victorian Women Travelers in West Africa* (Aldershot: Ashgate, 2000)。此外，涉及西方人在近代中國遊歷及其書寫者，則有 Sybille C. Fritzsche, "Narrating China: Western Travelers in the Middle Kingdom after the Opium War," (Ph. D. Disser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Nicholas J. Cliff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25 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外，可見 Majorie Morgan,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ravel in Victorian Britain*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該書部分討論到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人、蘇格蘭人與威爾斯人於不列顛聯合王國內部旅行的情況，及其所形塑出的各類相異的國族認同。此外，相關的散篇論文，可見 Stéphane Gerson, "Parisian Litterateurs, Provincial Journ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象與國族主義之中外學者，注意及此一面向的，尤屬鳳毛麟角。[26]是斯篇之作，或不無彌縫補苴之微勞。

另一方面，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及其對中國「疆域」的再現，所建構出的國族圖像，當然也並不是一幅如詩如畫、和諧統整的錦繡美景。Robert Sack 一再指陳，領域性策略的運作，乃是鑲嵌於具體的社會關係之中。一塊「疆域」的生成，必然蘊涵著特定的權力關係；領域性，作為一種權力的地理表達形式（g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power），其所反映的，只是那些掌控著領域性之設計與維持的優勢人群的需求與價值。[27]易言之，「疆域」乃是一項人為的創造物，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被生產出來，並為特定的目標服務。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同樣也強調，「地景」是透過特定的社會關係被生產出來；它是一套意識形態，是一種對外在世界仔細篩選與再現，從而賦予其一套特殊意義的過程。「地景」所發揮的作用，正是在引導、組織觀賞這些「地景」的受眾，建構他們對居於強勢地位之社會利益的認同與支持。[28]從這種角度觀察，特定「疆域」與「地景」的形成，殆為各種異質社會力量，彼此抗衡、妥協的結果。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在建構一套特定的中國國族認同之際，其實也同時形塑或鞏固了國族內部地區、族群、階級、性別等各類差異所構成的不均等的權力關係。因此，本文雖是以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為討論焦點，仍將針對這批主要是由漢族知識分子所書寫的文本，如何建構出一套階序性族群論述的複雜過程，稍作分疏。

---

151 (May 1996, Oxford), 141-173; Thongchai Winichakul, "The Others Within: Travel and Ethn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iamese Subjects, 1885-1910," in Andrew Turton ed., *Civility and Savagery: Social Identity in Tai State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0), 38-62.

26 筆者見聞所及，僅有 Jonathan Lipman 曾利用少量 1930 年代的旅行文本，討論時人對「中華民族」的不同想像方式。參見 Jonathan N. Lipman, "*Zhonghua Minzu:* Ethnic Unity and Plurality in Modern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NEGOTIATING THE SCOPE OF CHINESE STUDIES, Santa Barbara, CA, March 13-15, 2000.

27 Robert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5, 19.

28 Don Mitchell,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99-100.

二、「美麗新世界？」：開發西北聲中的西北旅行書寫

1930 年代，西北問題蔚為中國社會眾所矚目的焦點，不過，所謂西北地區的確切範圍，卻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29]大體而言，較為通行的說法，則以當時行政區劃下的陝西、甘肅、綏遠、寧夏、青海、新疆等六省之地為指稱。[30]

就其歷史地位與歸屬中國之時間先後而言，西北地區的各個不同部分，蓋有天壤之別。陝西、甘肅久隸中國本部，為中國文明之發源地，也是漢、唐盛世的政治、經濟、文化中樞。反觀陝甘境外，自古以來，長城一線，判隔胡漢，嘉峪關以外的遼闊疆土，盡屬各類邊疆民族活動建國的天地，雙方接壤的甌脫之地，更常淪為戎馬征戰的干戈疆場。直到清朝中期，歷經康、雍、乾三朝前後數十年多次用兵，終於在十八世紀中葉將內蒙、青海、新疆等地納入版圖，並因應各地不同的族群文化條件，分置盟旗、伯克等制，略示羈縻，與內地州縣，共同構成一套複雜的多元帝國體制。及清季同光以降，外力交迫，變亂迭乘，清廷為鞏固邊防，方於光緒十（1884）年將新疆正式建省。而內蒙之綏遠、寧夏與青海等地，更是遲至民國 18（1929）年，始由國民政府析置設省。[31]換句話說，西北的新、青、綏、寧廣袤無垠的土地，一直要遲至十九、二

29 關於各家對於西北地區範圍的不同說法，可參見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 期（1989 年 6 月，臺北），164~167；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1611。

30 1934 年，小說家張恨水作陝甘之遊，撰為〈西遊小記〉一文，開宗明義，劈頭便說：「西北這兩個字，包括得很廣，計有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綏遠、新疆六省。」或足以反映斯時知識大眾對西北地區的一般看法。見張恨水，〈西遊小記（一）〉，《旅行雜誌》8 卷 9 期（1934 年 9 月，上海），7。1936 年《西北嚮導》第 17 期所刊〈論編撰西北年鑑〉一文中也說：「近來始公認以綏、陝、甘、寧、青、新六省為西北之範圍。」引見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167。

31 參見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167~168。

十世紀之交，才在打造現代國家（state-building）的國族主義計畫下，逐步被整合納入「中國」的範疇之內。

不過，西北各地與中國的歷史聯繫雖有長短久暫之別，但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內地社會大眾的心目中，整片西北地區無分遠近，其所構成的，卻是同樣一個僻遠荒涼、險惡陰森的邊鄙意象。1906 年，裴景福自廣州謫戍伊犂，道經隴西山丹縣境，舉目遠望，「沙磧荒坡，人煙斷絕，不見一草一木，塞山負雪，寒威逼人，并哀鴻斷雁而無之」。[32]1924 年，王桐齡應西北大學暑期學校之聘，由京赴陝，所經豫陝交境處，「二百里間，岸上無市鎮、無居民，惟時見水面上有粗笨之木造貨船往來，荒涼寂寞，彷彿入洪荒世界。」[33]寥寥數語，便將關隴邊地落後苦寒的蕭瑟景象，刻劃殆盡。陝甘猶復如此，遑論重山遙隔的新、青等新附之區！1921 年，存吾為杭州人錢之萬新疆遊記作序，便喟然感嘆道：「杭為東南勝地，氣候溫煦，交通便利，文化發達；新疆位西北邊陲，寒暑劇烈，荒涼阻塞，人跡鮮少，文野之殊，蓋有難言者。」[34]

西北地區所以在時人心目中留下如斯不堪的刻板印象，自有其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複雜背景，而交通運輸條件困難所造成的阻絕隔閡，要不失為一項重要因素。[35]在現代鐵公路出現之前，旅行西北，大抵仰賴騾、馬、駱駝等為負載之具，加以西北各地崇山峻嶺、地勢崎嶇，沙漠草原、重重險阻，遠途跋涉，至為艱困。1925 年，北京大學校醫陳萬里隨美國考古隊赴敦煌考古，於 3 月 17 日乘大車自西安西行，4 月 5 日抵蘭州，753 公里的路程，花了將近 20 天的時間，當時人卻對其速度之迅捷驚羨不已，蓋西蘭一道沿途河流縈迴、山巒峻峭，車行極為困難，

32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1909 年原刊；楊曉霞點校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208。

33 王桐齡，〈陝西旅行記〉，《地學雜誌》第 15 年秋期（1924 年 10 月，北京），64。

34 存吾，〈錢之萬「到新疆之路」序〉，《地學雜誌》第 13 年 6 / 7 合期（1922 年 10 月，北京），51。

35 關於道路交通在國族整合上的重要作用，Eugen J. Weber 曾以十九世紀法國為例，作過淋漓盡致的刻劃，參看 Eugen J.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通常行旅，搭乘騾車或馬車，約需一月始達，即輕裝騎行，亦須 25 日之久，故一般人聞及西赴甘省，莫不躊躇裹足。[36]1933 年夏，上海《新聞報》記者顧執中號召同志，組織青海考察團，赴青遊歷。其由蘭州以赴西寧，既無火車，亦不通汽車，僅能騎騾循著千百年前玄奘及馬可波羅等人所曾走過的路徑，跋山涉水，緩緩前進，共行六站，方抵 460 華里外的西寧。[37]至若由內地踹赴新疆地區，其曲折艱難的程度，尤屬匪夷所思。裴景福遣戍新疆，於光緒三十一（1905）年 3 月底自廣州起程，次年 4 月初始抵迪化，全程不過 11,720 餘華里，卻耗費了超過一年的時間。[38]二十餘年後的 1932 年，外交部特派員吳藹宸受聘入新，則是由天津搭船，假道日本，再轉赴海崴威，搭乘西伯利亞鐵路以抵塔城，前後共行 24 日。對於這樣奇特的旅行方式與其所反映的西北交通問題，吳藹宸不免感慨係之地說道：「應遵陸西征者，乃竟浮海東渡，經過日本、蘇聯，而後到達我國西陲，此種旅行方式恐為他國所無，即此一端，可知西北之危機矣。」[39]

由以上例證觀察，1937 年顧頡剛於甘肅西南及青海西寧一帶考察教育之後，所以會斷言西北最嚴重、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乃是交通問題，自非無的放矢的無根游談。[40]

可想而知，交通阻梗所造成的惡劣旅行條件，必定嚴重抑扼了內地都會地區知識大眾深入西北旅行遊歷的意願與熱誠。即便在風氣漸開的

36 陳萬里，《西行日記》（原刊北京：樸社，1926；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重印本），37~50；參見高良佐，《西北隨軺記》（南京：建國月刊社，1936），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4 輯 13 卷，129 冊，162。

37 顧執中、陸詒，《到青海去》（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0 卷，126 冊，136~160；參見顧執中，《戰鬥的新聞記者》（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221~222。

38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11。

39 吳藹宸，《新疆紀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

40 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1938 年 10 月講於中央政治學校附屬蒙藏學校〉，《西北史地》1984 年 2 期（蘭州），12~13。

1930 年代，一般人對於遠遊西北，依然戒慎恐懼，視為畏途。范長江於其《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便指出，一般人總覺得青海太過邊荒，「入了青海，至少有充軍到西伯利亞那樣的滋味。」[41]1934 年，上海知名小說家張恨水作陝甘之遊，於籌劃西行之初，所聞所見，「只有掃興的消息」，已不免於躊躇猶豫。事後追憶，依然深覺旅行西北，備極艱辛，「比旅行東南各省，那真是天上人間」。[42]

由於物質條件與心理因素的雙重制限，近代中國內地的知識階層，苟非遭逢奉使、仕宦、貶謫等身不由己的境遇，殆鮮有主動涉足西北邊地者。[43]抗戰前夕，顧頡剛師生一行旅行到甘肅邊境的渭源，當地人便對他說，自從大禹以後，還從沒有過像他們這樣的知識菁英造訪該地。[44]縱使是得風氣之先，早於 1924 年即在北京倡組西北學會、發行《西北月刊》的馬鶴天也自承，斯時所得同志甚少，而曾經涉足西北、從事過實地調查者更是屈指可數，馬本人便是尚未親歷西北之一人。[45]這種情況，長期積累，直到 1920 年代，無論政府當局抑或社會大眾，對於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依然十分隔閡與無知。[46]關於西北地區的記載與論述，也備受一般人的輕忽與漠視；涉及西北的旅行書寫，不但數量寡少，更罕有付梓行世的機會。曾經在民國初年兩度深入新疆、遍歷天山南北的林

41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天津：大公報館，1937 九版），131~132。

42 張恨水，〈西遊小記（八）〉，《旅行雜誌》9 卷 4 期（1935 年 4 月，上海），29；〈西遊小記（十一）〉，《旅行雜誌》9 卷 7 期（1935 年 7 月，上海），65。

43 當然，這並不意謂內地與西北並無交通往來；反之，自古以來，由於商業、軍事、宗教乃至犯罪、逃荒等因素，內地漢人之旅行西北，乃至於當地安家立業者，為數至為可觀，惟此現象，固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44 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13。

45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南京：國民印務局，1936；臺北：南天書局，1987 影印本），〈自序〉，1。

46 民國初年的一段軼事，正可反映時人對西北地區的無知與陌生。1913 年，川、青（時歸甘肅寧海鎮守使管轄）兩省互爭囊謙（玉樹）之地（該地川名隆慶），交相馳電北京政府，而中央竟不知囊謙、隆慶實為一地，居然判准隆慶歸川、囊謙歸青，由川甘兩省派員會同劃界。見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第二編（上海：中國邊疆學會，1947），384~385。

競，對於此等困境，尤具切身之體會。1916 年，林競初遊新疆，回到內地後大力鼓吹開發西北，不料，「談起西北兩個字，聽的人十個倒有九個要瞌睡」；1918 年，他將旅行見聞整理成《新疆紀略》一書，商務印書館卻因銷路不廣，不肯代售。[47]

然而，這種蕭條寂寞的景象，到了 1930 年前後，卻驟然發生了戲劇性的重大變化。一時之間，旅行西北蔚為風尚，各色各樣的個人與團體相率投入前往西北考察遊歷的行列，他們所書寫的旅行記述，也成為報章雜誌與出版機構爭相刊載印行的熱門商品；甚至許多寫就多年，始終無緣出版的舊作，也在這段期間，重獲青睞，陸續梓行，與上引林競所言乏人問津的窘況，形成極其強烈的對比。端就具備書籍形式的西北旅遊記述而言，其出版於 1928 至 1945 年間，而為目前所尚能搜羅者，便不下四十種之多，在數量上幾為前此五十年間同類著述的四倍。[48]這些遊記，不乏先於報章雜誌連載，再結集成書者，及其出版後，往往猶能引發讀者搶購的熱潮。以當時最為風行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為例，該書作者范長江於 1935 年 7 月，以天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名義，隻身由成都出發，經川西、越大雪山，度隴南，出入祁連山，沿河西走廊，繞賀蘭山，以入內蒙，十餘月間，足跡遍歷陝、甘、青、寧、綏的西北五省，行程約一萬二千餘里。沿途，他為《大公報》撰寫了近百篇的旅

47 林競，〈青海風土記序〉，原收入楊希堯，《青海風土記》（西寧：甘肅西寧區公署印局，1928），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9 卷，125 冊，10。

48 1930 年代與西北相關的旅行書寫，自然遠遠不僅此數，惟本文討論範圍主要集中於公開發行問世，且在性質上屬於遊記文類的敘事性文本，因而若干過於專門而不具敘事性的學術與實業調查報告，如 1927 至 1930 年間黃文弼於內蒙、新疆進行考古工作的報告，與 1943 年羅家倫率領「西北建設考察團」赴西北考察後所出版的實業調查報告，均非本文所能論及。分見黃文弼遺著、黃烈整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羅家倫，《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無出版地，1944）。另一方面，1930 年代中共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於陝北建立根據地後，基於情勢所需，也曾對西北各地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族群狀況進行過大量調查。不過，這些調查報告，大抵均屬中共內部參考文件，並未公開出版，更非內地一般知識大眾所能知悉，因而亦不在本文所涉及範圍之內。關於本文在資料上的這些重大限制與不足，兩位審查人均曾提出指正，特此誌謝。

行通訊，陸續發表後，轟動全國，贏得巨大迴響。[49]次年 8 月，范長江將這批西北通訊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由大公報館出版。甫經發行，各界爭購，初版數千部未及一月即行售罄，不得不趕印再版，至 1937 年 12 月，該書已連續發行九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膾炙人口。直到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為學生所選定的課外讀物中，該書依舊名列榜首。[50]他如上海《申報》記者陳賡雅，亦曾於 1934 年赴西北地區進行為期長達一年多的採訪調查，並撰寫通訊，於《申報》連載，「備受讀者之歡迎」，進而於 1936 年結集為《西北視察記》一書，由申報館出版。[51]

之所以會有如此奇兀的轉折，1930 年代西北交通運輸條件改善所發揮的作用，自難忽略。1935 年，隴海鐵路展延至西安，同年 5 月，西蘭公路正式通車；同時，歐亞航空公司亦陸續開辦上海、南京與西北主要城市之間的往返飛航班機。這些有形的物質建設，當然為前赴西北的旅行者，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一旦汽車通行，正常情況下，西安至蘭州 4 日可達，[52]蘭州至西寧，更僅需一天的時間；[53]若是搭乘飛機，則其快速便捷，固無庸待言。1939 年，李孤帆自香港往遊西北，由香港飛重慶、繼由重慶飛蘭州，都各只花了 6 小時。[54]而 1932 年，黃汲清自川入新，由成都起飛至降落蘭州，只耗費 3 小時左右，自蘭州經嘉峪關續飛迪化，加計氣候因素所造成的延誤，也不過用掉將近 7 個小時。[55]較諸二十世紀初期裴景福入新所經歷的遲滯稽延，其間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

另一方面，1930 年代中國旅遊事業的發展，也為西北旅行提供了有

---

49 徐向明，《范長江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58。

50 徐向明，《范長江傳》，93；該書再版次數與時間，見長江，《中國的西北角》，版權頁。

51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上海：申報館，1936），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6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影印本）；徐向明，《范長江傳》，92。

52 錢菊林，〈西蘭旅行隨紀〉，《旅行雜誌》10 卷 4 期（1936 年 4 月，上海），32。

53 莊澤宣，《隴蜀之游》（上海：中華書局，1937），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7 卷，133 冊，144。

54 李孤帆，《西行雜記》（出版時地不詳），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9 卷，135 冊，234。

55 黃汲清，《天山之麓》（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6~10。

利的誘因。1923 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於上海銀行附設旅行部，1927 年，中國旅行社正式設立，是為中國現代觀光旅遊事業之濫觴。中國旅行社創辦伊始，即刊行《旅行雜誌》，積極鼓吹國內外旅遊之風，復於全國各地交通要衝及觀光勝地遍設分社，承辦票務、貨運、食宿等各項旅行事宜。1930 年以後，中國旅行社更增設遊覽部，經營全國性的旅遊活動，著手建設及開發相關旅遊資源與設備。至抗戰期間，中國旅行社已在西北各地陸續創設多所規模大小不一的招待所，供應往來行旅現代化的食宿設備。[56]知名小說家茅盾行腳西北，路過六盤山巔、寂寞荒涼的華家嶺，便曾受惠於中國旅行社所設招待所，乃至特撰專文，頌揚該所職工為旅人所作鉅大貢獻。[57]

不過，1930 年代交通食宿的局部發展，尚遠不足以全盤改善西北地區的旅行條件。以西蘭公路而言，山路崎嶇、盜賊猖獗，加以車輛極少、機件老舊，一遇雨雪，即泥滑難行，照章 4 日可達的行程，實際上往往需要 8、9 天的工夫，時間既不經濟，旅途復多危險。[58]而鐵路與公路幹道所未能通達的多數地區，更仍處於極度落後的原始狀態。上述的李孤帆從香港前後共費 12 小時飛抵蘭州後，往遊甘肅西南隅的拉卜楞（夏河），短短 400 里路，居然走了足足 6 天，而途中食宿麤劣，夜難成寐的苦況，尤為其想像所未及。[59]至若航空飛行，匪特班次奇少、座位有限，其票價之昂，更足咋舌，苟非達官貴人、豪商巨賈，殆絕無負擔之能力。[60]1937 年初，范長江由包頭赴寧夏採訪，所搭歐亞航空班機，總計 16 個座位，卻僅搭載了 4 名乘客，絕大多數的旅行者困於高達百餘元

56 王淑良、張天來編，《中國旅游史・近現代部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208~229。

57 王淑良、張天來編，《中國旅游史・近現代部分》，228。

58 錢菊林，〈西蘭旅行隨紀〉，32；莊澤宣，《隴蜀之游》，144。

59 李孤帆，《西行雜記》，234~235。

60 據《禹貢半月刊》所作調查，1936 年歐亞航空公司每週各有一個班次自上海、南京往返西安、蘭州、酒泉、哈密、迪化、塔城等地，所定單程票價如下：上海至西安，175 元；至蘭州，405 元；至酒泉，705 元；至哈密，980 元；至迪化，1,230 元；至塔城，1,505 元。見〈新疆之交通〉，《禹貢半月刊》5 卷 8、9 合期（1936 年 7 月 1 日，北平），112~113。

的票價，還是只能因循舊貫，「在地面繞著黃河大彎曲，七十里、八十里一站的跑」。[61]

因此，1930 年代中國內地都會所興起之西北旅行與旅行書寫的熱潮，殆非物質條件的變化所能充分解釋，而必須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作進一步的探析。質言之，當時人所以競相前赴西北遊歷考察，並將旅遊見聞書寫成文，毋寧乃是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大力鼓吹「開發西北」，所造成的效應。

近代中國開發西北的議論，肇始於十九世紀前半期。有清嘉、道之際，經世致用，蔚為學風，研究西北邊疆史地，漸成顯學，學士大夫苟不講求塞外輿地、蒙兀歷史，殆不足躋身儒雅之林。斯時，龔自珍即已提出新疆建省、移民實邊、改革屯政、積極經營的主張。[62]魏源更明白指出，中國內地人滿為患，而新疆地曠人稀，農牧礦資源豐厚，「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為盛世消息尾閭者也」，因而倡議徙民西向，大力開發。[63]及同、光年間，陝、甘回變，西北大亂，俄人復進據新疆伊犁一帶，伺機進窺；內憂外患，交相迭乘，西北邊地，形勢日蹙，如何開發西陲，鞏固邊圉，遂成時人矚目之迫切課題。光緒初年，左宗棠於平定陝甘、規復新疆之餘，便已因地制宜，提出興修水利、發展畜牧、種桑植棉、養蠶織布的規劃。[64]1878 年，江西貢生黃楙材更奉總署之命，費時兩年，週遊西南、西北各地，撰為〈遊歷芻言〉等文，率先倡議於西北修築鐵路、架設電報，俾便「長駕遠驅，保固疆圉」。[65]這些論述，雖未克全面付諸實行，要已為 1930 年代的開發西北運動，奠基立礎，開

61 范長江，《塞上行》（長沙：大公報館，1937；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重印本），134。

62 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1612；郭双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77~94。

63 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收入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4 輯，1979 影印本），卷 80，「兵政・塞防上」，3b。

64 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170~171。

65 黃楙材，〈遊歷芻言〉，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 影印本），10 帙，436。

創先聲。

逮民國肇造，政局多故，西北問題轉趨沉寂，除少數有心人士，朝野公私，鮮有注意及此者。及 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四省相繼淪喪，中國面臨前所未有之深重國族危機，為人漠視已久的西北地區，才又在短短數年之間，喧騰眾口，蔚為舉國矚目的議論焦點。1930 年代初期，於綏遠從事實地調查的樊庫便曾指出：「自東北四省淪亡，國人視線始集注於『西北』，而開發『西北』之聲浪乃高唱入雲。」[66]汪昭聲於抗戰末期回顧民國時期「開發西北」運動的興衰起落，更明白宣稱：「在『九一八』失掉東北四省的刺激之後，於是如何建設西北的課題，重新又被大家重視而提出來，而且是盛極一時」。[67]

1932 年初，南京國民政府在日軍發動淞滬事變、進攻上海的巨大壓力下，一度宣布遷都洛陽，並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準備於中日戰爭一旦全面爆發，立即遷都西安。相應於此，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及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相繼討論通過「開發西北」的議案，並責成全國經濟委員會召集西北各省行政長官暨專家學者，共同擬議開發西北之全盤計畫。全國經濟委員會乃於 1934 年 2 月成立西北辦事處，積極推動移民墾殖、交通建設、興修水利、探勘工礦資源等各項開發計畫。[68]同時，各級政府機關，也相率訂定各類獎勵辦法、籌組考察團體，鼓勵國人前赴西北遊歷考察。[69]

不同於晚清「開發西北」議論之僅侷限於少數有識官紳士夫者，1930 年代的「開發西北」運動，一經發軔，迅即贏得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與

66 樊庫，《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自序〉，引見馮家昇，〈再介紹「到西北去」的一部書〉，《禹貢半月刊》1 卷 12 期（1934 年 8 月 16 日，北平），27。

67 汪昭聲，《西北建設論》（重慶：青年出版社，1943），1；引見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1622。

68 參見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176~183。

69 如國民政府內政部即曾於 1931、1935 等年兩次頒布〈提倡國人考察邊境辦法〉，除對國人前往西南、西北邊區旅行考察加以明確規範外，復要求各地行政機關嚴加保護，並給予半價搭乘火車之優惠。見陳賡雅，《西北視察記》，3；王衍祜，《西北遊記》（廣州：清華印務館，1936），〈附錄二：提倡國人考察邊境辦法〉，64~66。

廣泛參與。在國亡無日的危機意識驅迫與政府當局的大力誘導下，中國知識階層紛紛將國家民族的出路寄託於邈遠而神秘的西北地區。例如在 1920 年代編輯《古史辨》，以「疑古」學風名噪一時的顧頡剛，也在此時幡然改圖，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致力於沿革地理與邊疆史地之研究；抗戰前夕，他更糾集學界同志，擬訂一項深入西北各地，進行全面調查的考察計畫。[70]1936 年，周飛在評介《中國的西北角》一書時，便對當時一般社會大眾的心態變化，作過一段生動而極富感性的描述：

>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這五年中中國的上上下下無不在苦悶中、在徬徨中，他們要在苦悶中求解脫，要在徬徨中尋出路。……他們時時在尋求，在尋求中華民族的出路。在這尋求的過程中，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了西北。[71]

在這股「西北熱」的強力激盪下，1930 年代以研究西北為職志的學會社團，相繼創立；以西北為討論對象的各類刊物，亦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據統計，近代中國的中文期刊中，其刊名冠有「西北」二字者，出版於 1930 年以前者僅得 5 種，而 1931 至 1945 年間出版者，竟多達七十餘種。[72]至於一般報章雜誌之刊載相關意見與構想者，尤屬司空見慣，不勝枚舉。甚至上海明星電影公司也在 1934 年拍攝了一部《到西北去》的影片，鼓舞國人投入開發西北行列。[73]誠如范長江所言，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從報章雜誌宣傳討論到要人的視察、專家的設計，以至於

---

70 關於《禹貢半月刊》所反映之顧頡剛學術取向的變化及其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關係，參見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143~164。顧頡剛本人於《西北考察日記》的自序中，也對其於 1930 年之後，「遽易昔者寂寞窮經之心志」，將治學方向轉往民族史、邊疆史的心路歷程，有所剖析。見顧頡剛，〈自序〉，《西北考察日記》（無出版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2。

71 周飛，〈評《中國的西北角》〉，《國聞週報》13 卷 19 期（1936，天津），後轉錄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之三版代序，見長江，《中國的西北角》，〈七版代序〉，2。

72 胡斯振，〈西北學芻議〉，《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5 年 1 期（蘭州），30；引見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1622。

73 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177。

實際建設工作的進行，『開發西北』的聲浪震動了一般國人的耳鼓」。[74]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與書寫，也正是這股「開發西北」熱潮的直接產物。從本文所蒐羅之出版於 1928 至 1945 年間的 42 種西北旅行記述，可以看出，這些旅行者的身分相當複雜，已不再侷限於政府官員，也包含了教授、學生、技術專家、新聞記者、海外華僑與軍事人員。[75]他們前赴西北，也不復出於被動的赴任、調職、譴戍等際遇，而往往是主動參與各類考察團體，從事教育、實業、地質等各項專業調查，究其緣由，便與「開發西北」的國族主義計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政府要員奉派出使、遊歷西北者，固然相率以此為標榜，[76]而一般人之前往西北，也莫不挾此名義，來強調其旅行活動的價值與意義。1935 年，廣州大學教授王衍祜與該校部分畢業學生，便是「感於東北淪陷、國難日深，今後民族出路，開發西北，實不容緩」，因而共組考察團，前往陝、綏、寧等省實地考察。[77]1933 年，《新聞報》記者顧執中組團赴青海考察採訪，也是將此行視為將來進行邊疆文化事業的張本，「同時以考察

74 長江，《中國的西北角》，104。1934 年，北平一名女大學生更由於經常閱讀「開發西北」的論文，對西北邊疆充滿憧憬，以致偶有機會參加平綏路局所組織的「西北考察團」，得以實現「到西北去」的熱望時，竟至以「哥倫布奉了西班牙女王的上諭」，來形容其心中的驚喜。見孫媛貞，〈一週間西北旅行記〉，《禹貢半月刊》3 卷 2 期（1935 年 2 月 16 日，北平），28。

75 本文所論之 42 種西北旅行文本的 40 位作者中，其出身背景大致如下：各級政府官吏暨技術專家 8 人、學者教授 13 人、記者編輯 9 人、大學學生及留學生 2 人、軍官 2 人、華僑 2 人、政治活動者 1 人、身分不明者 3 人。此外，這 42 種西北遊記，以出版地分，計為：上海 18 種、北平（京）4 種、南京 3 種、重慶 3 種、天津 2 種、廣州、香港、無錫、桂林、西安、太原、蘭州、西寧各 1 種，不明者 4 種。這種分佈狀況，充分顯示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及其書寫，主要乃是以內地都會地區知識階層為主體。

76 如 1935 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邵元冲代表中樞謁祭黃陵後，鑒於「近年來開發西北之呼聲，遍於全國，前往調查考察者，踵趾相接」，因而決定循隴路深入西北各地，詳加視察，「並隨帶電影技術員，攝取各地人民生活情況，及各種建設成績，……將來以視察所得，貢獻中央，作開發西北計畫之具體參考。」見高良佐，《西北隨軺記》，129。

77 王衍祜，《西北遊記》，1。

所得，報告國人，以喚起國人對邊疆的注意」。[78]甚至返鄉省親治喪的私人旅行活動如劉文海者，於其遊記出版之際，也要在序文中加上一段「供留心西北問題者之參考」之類的門面話語。[79]由是以觀，就其所由生產的歷史脈絡而言，1930 年代中國社會的西北旅行，既不同於傳統文人雅士耽山臥水、寄情煙霞的旅遊活動，也與十九世紀中期形成於歐洲，以觀光休閒、增廣見聞為導向的現代旅遊事業大相逕庭，而毋寧更近似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伊朗知識分子所鼓吹的國族主義式的旅行模式——在這種特定的論述形構中，旅行被視為是認識國族疆土各類地理景觀、了解國族文化獨特性，從而強化國族整合、抗禦外力侵侮的重要法門。[80]

這種特殊的取向與關懷，當然也對這些旅行者記述其見聞經歷時，所採取的敘事策略與書寫模式，發揮了重大的形塑作用。1930 年代中國知識階層，便曾透過西北旅行與書寫所構成的文化生產場域，[81]重新釐定了「旅行記述」這種古老的特殊文類所應具備的風格、內涵與社會功能，從而建構出一套傅柯式（Foucauldean）的「旅行經濟學」（economy of travel）。

早在 1926 年，顧頡剛為赴敦煌考古的陳萬里所著《西行日記》作序，便對傳統文人學士但知流連名山勝境、抒懷感興的「清遊」活動大加譏刺。他強調，理想的旅行，應當取法明末的徐霞客，從事於長途的搜奇探險，更應自覺地擬定明確之目標，並將旅途中的見聞儘量收羅記載，

78 顧執中、陸詒，《到青海去》，20。

79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上海：南京書局，1933），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8 卷，124 冊，〈自序〉，14。

80 Firoozeh Kashani-Sabet, “Picturing the Homelan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nth-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r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4:4 (1998, London), 419.

81「文化生產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一詞，取自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撰論文集之書名，見 Pierre Bourdieu,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供作學術研究之材料。[82]換言之，在他看來，旅行這種空間位移的活動，其意義所繫，並非經由個人與自然景觀的互動交融，求取心靈慰藉與感情寄託的美學價值，而是藉著理性認知與客觀描述，獲致對外在現象的「科學」知識。

這種高度知識化的「旅行經濟學」，在 1930 年代，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與詮釋。地質學者翁文灝為楊鍾健記述其西北地質考察之旅的《西北的剖面》一書作序，即明白界定了「真正的遊記」的標準。他以德國地理學者、著名旅行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所撰《中國》一書為範例，指出：「老式遊記」或僅知賣弄辭章、鋪張篇幅，或但記行臥飲食，宛如刻板之起居注，都不足以稱作真正的遊記；所謂「真正的遊記」，「至少要使人讀了能有像身臨其境的真切感想，或者更進一步，能對於其地得到一種提綱挈領的瞭解」。要能達到這樣的標準，旅行者本身必須具備「觀察的知識與瞭解的能力」，然後於旅途中，根據「科學的觀察」，對所見事物尋求深入的瞭解，並且把這種觀察與瞭解，明白具體的寫出來，以喚起一般社會的注意。[83]楊鍾健本人於其《剖面的剖面》一書的自序中，也將遊記文學分為新舊兩種，而分判新舊的準據，正取決於知識的正確與否。舊式遊記，縱使文筆精妙、寄寓深遠，卻「往往泥禁於古來書本或古典中」，不足以精確記述事實，以訛傳訛，有不如無。反之，新式遊記的目的正在於將正確的知識傳達給讀者。理想的遊記，對於所經之地的地形山川、地質背景、地理狀況，以及人情風物，都應當予以正確的記載；此種客觀、真實的描述，再佐以優美的文筆，「自然是適合於現代科學化的遊記」。[84]如果借用 James Duncan 對十九世紀前往非洲探險之歐洲旅行者所書寫之旅行記述所作的分類，1930 年代西北旅行者所鼓吹的書寫形式，正可劃入「資訊的或

82 顧頡剛，〈《西行日記》序〉，收入陳萬里，《西行日記》，6~11。

83 翁文灝，〈《西北的剖面》序〉，收入楊鍾健，《西北的剖面》（北平：地質圖書館，1932），1~3。

84 楊鍾健，〈《剖面的剖面》自序〉，《禹貢半月刊》7 卷 1~3 合期（1937 年 4 月 1 日，北平），336~337。

科學的」（informational or scientific）文類範疇。[85]它所構成的，乃是一種 Mary Louise Pratt 所謂之「科學性」的「反征服」（anti-conquest）敘事模式。[86]

然而，如同 Pratt 在不同理論脈絡下所指出者，旅行書寫不僅是一種文類，同時也是一套意識形態。[87]在 1930 年代國族主義激情昂揚的歷史背景中，這套由顧頡剛以迄楊鍾健等人大力闡揚的新興旅行文類，所試圖建構的「正確知識」，自然不只是嚴格意義的學院知識，而更是足以「喚起一般社會的注意」的國族知識。1942 年，中國旅行社經理潘恩霖在該社選輯《旅行雜誌》彙編為《西北行》一書的序言中，便明白指陳，在國族瀕亡的危急關頭，旅行活動已不能但以遨遊攬勝為能事，而更須抱持明末大儒顧炎武「體國經野」之悲願，始得以言登山臨水。該書刊行的目的，即企圖假文字宣傳之力，配合時代需要，誘導國人旅行西北，「胥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以為「開發西北」略盡棉力。[88]《申報》記者陳賡雅更對其長達年餘、備嚐艱辛之西北行旅的動機與目的，

85 James Duncan 將這些非洲探險的旅行書寫劃分為兩種文類：「英雄歷險式」（heroic）與「資訊或科學的」。See James Duncan, “Sites of Representation: Place, Time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 in James Duncan and David Ley eds., *Place / Culture / Represen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50.

86 Mary Louise Pratt 把十八、十九世紀前往非洲及拉丁美洲旅行的歐洲資產階級旅行家所生產的書寫文本，與之前以海外征服探險、建立殖民地為主要取向的旅行書寫，作了嚴格的區分。她認為，前一類旅行者極力尋求一種「無需征服與暴力」的佔有方式；其旅行書寫的特質，乃是「在強化歐洲的宰制霸權的同時，也試圖保有他們自身的清白」。Pratt 把這種特定的書寫模式稱作「反征服」（anti-conquest）。這種「反征服」奠基於旅行者對「客觀」事物從事觀察、分類、測繪，而非支配的凝視之上。Pratt 並將之細分為「科學的」與「感傷的」（sentimental）等兩種對立而互補的次文類；而「科學的」反征服書寫，正是以對被觀察之客體的描述、分類與詮釋為其主要內涵。參見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7, 57, 80.

87 Mary Louise Pratt 所關懷的是歐洲海外探險的旅行文本如何建構了一套關於自我與他者的帝國主義殖民論述，因而她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既是一項對文類的研究，也是一個對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的理論取向，自與本文重點有所軒輊。見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4.

88 潘恩霖，〈序言〉，收入茅盾等著，《西北行》（桂林：中國旅行社，1943），1~2。

有過這樣一大段詳盡的告白：

> 昔者……詩人墨客，躡蹻擔簦，探奇選勝者，代不乏人。而詠歎遊賞之詩文，尤至不勝枚舉。然皆模範山水、寄興抒懷之作；而絕少涉及其地其時社會組織之利弊、人民生活之苦樂者。作者仰冀曩哲，踵武前修，此遭斬荊榛、犯風雪，歷程數萬里，而所持之旨趣，則異乎是：舉凡各地民俗風土、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均在采訪考察之列。名山大川、古蹟勝境，假以機緣，固往登陟；而荒陬廢壘、破窰羊圈，亦多加造訪。當地名流、地方當局，自往訊以社會之情事、設施之概要；而農夫力役、編戶工礦，亦就以探索生活環境之實際資料，俾轉以公諸社會，並供負責治理及肄討學術者之參考。信能循茲以為興革政俗、改進社會之張本，則作者間關跋涉之勞，庶幾其不等諸虛牝，而足以自慰於萬一者乎？[89]

由此可見，1930 年代中國的主導性旅行論述中，西北旅行及其書寫，一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暹羅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所曾進行過的類似活動，都是在新興的國族意識激勵下，於國境內部所從事的空間運動，也都是建構一套包攝國族各種不同面向之真實狀況的知識系統的宏大企圖與努力。[90]

相應於這套偉大知識計畫對「真實性」的嚴格要求，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莫不刻意強調其旅行記述，乃是對客觀現實的「真實」再現。他們對於以往西北遊記文類充斥著抄襲性的相互引用（plagiarizing intertextuality）的成規慣行，力加抨擊；[91]絕大多數的旅行者也都利用逐日敘事的日記體裁，強調其為個人「在場」（presence）的親身經驗，來證成（justify）其所書寫之文本的知識權威。徐炳昶於其《西遊日記》的序言中，便明白指斥謝彬所撰《新疆遊記》一書，「大段抄錄成書並

89 陳賡雅，〈自序〉，《西北視察記》，5~6。

90 Thongchai Winichakul, “The Others Within,” 43.

91 L. J. Newby 已指出清代有關新疆的旅行書寫，便充斥著相互剿襲的現象，如七十一所著《西域聞見錄》，便曾為林則徐等人所大量引錄。See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Modern China* 25:4 (Oct. 1999, Beverly Hills), 453-454, 457.

且採道聽塗說的話，引他族人的反感」。[92]顧執中參加陝西實業考察團，則於旅行途中，四處探詢當地物價高低、農產狀況，每至工廠礦坑，復動用儀器進行檢驗，「除口舌上之詢問外，又可得科學上之證明，自信於考察二字，相距尚不甚遠」。[93]1933 年，明駝自蘭州往返敦煌，將沿途所見各地現況與山川風物，詳加記述，寫就《河西見聞記》一書，同樣極力宣稱，其所記內容，全係以純粹「客觀」的態度採集得來，全書最堪自信者，便是「真實」二字。[94]部分旅行者甚至大量採用表格化的再現形式，將見聞所及的「實際情形」，轉化為一系列「客觀」、抽象，並可相互比較的數字，藉以強化其書寫內容的真實效應。[95]

在這種以科學知識與客觀真實性為標榜的旅行論述下，1930 年代這群主要來自上海、南京、北平等內地各大都會的政府官員與知識菁英，筆下所再現的西北地區，大體沿襲舊有模式，仍是一幅極度落後原始、荒蕪淒涼的景象，與繁華進步、文明舒適的都市生活適足構成強烈的對比。1932 至 1933 年間，林鵬俠初遊西北，計由潼關入陝，以抵甘肅邊境，「無時無日，不在危區慘境之中，令人起生意垂盡之感」。[96]吳藹宸遊歷新疆一年有奇，也一再致慨於該地「故步自封，仍過其太古生活」，交通狀況、工商實業較諸唐代玄奘所記情景，殆全無改變。[97]而劉文海於 1929 年冬由哈密越蒙古草地東返，風雪凜冽，盜警頻傳，復以糧斷水絕，幾瀕於死，始得於千辛萬苦之中，抵達綏遠，返顧前塵，更有「另生一世」之感。[98]這些陰鬱慘苦的描述，生動地刻劃出 1930 年代時人心

92 徐炳昶，《徐旭生西遊日記》（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1930），冊 1，〈敘言〉，14。

93 顧執中，《西行記》（上海：出版者不明，1932），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3 輯 35 卷，110 冊，52。

94 明駝，〈自序〉，《河西見聞記》（上海：中華書局，1934），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9 卷，125 冊，101。

95 例見高良佐，《西北隨軺記》。

96 林鵬俠，《西北行》（原刊 1936 年；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重印本），150。

97 吳藹宸，《新疆紀遊》，253。

98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266。

目中「西北」的可怖形象——一個彷如「人間地獄」的西北。

然而，弔詭的是，這種「人間地獄」的西北論述，卻也為另外一套針鋒相對的西北論述——「世外桃源」的西北，[99]提供了發展的可能。如上所述，1930 年代西北旅行者基本上承襲了清末以來「開發西北」的論述模式，更在此一基礎之上，進一步推闡發揚；西北不僅在鞏固邊圉、卵翼腹心的國防意義上，具備關鍵作用，抑且蔚為國家民族未來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憑藉。因而，在他們眼中，西北地區荒涼落後的現況，並非不可改變的天然缺陷；反之，西北大地，面積遼闊，形勢險要，資源富庶，物產豐饒，實為立國命脈之所繫，但因長久以來，人謀不臧，因循苟且，致令利源未闢，貨棄於地，苟能借助現代知識與技術之力，調查規劃，併力開發，則西北地區，固能為國家民族的光明前景，提供一片嶄新的天地。1930 年，林競於其所著《西北叢編》的自序中，便說：

> 具二百三十八萬餘方英里，居全國七分之四之廣土，蘊五行百產之精英，為歷史文化之起點，江河之所源，萬山之所始，膴膴焉宜牧也，蕩蕩焉宜農也，輗軏亞之中樞，具天然之原料，則宜工而宜商焉。……舉之以示國人，知之者有幾人哉？知之而潛然以思，謀所以闢大荒、探寶篋，而圖為不朽之業者有幾人哉？[100]

林競並進一步將西北地區與內地各省相互比較，他指出，後者人滿為患，地力將盡，加以不平等條約重重束縛，社會上各種既有之惡勢力，復又根深柢固，不易摧滅，以故雖有良善制度與政策，而事倍功半，施行至為困難；反之，西北各地，則「猶如璞玉素箋，任吾刻畫，理想世界、黃金政治，均可隨時日而收功」。因此，他呼籲國人之有志者，「毋為雞鶩得失之爭，大澈大悟，相率投荒，共作千秋萬世之業」。[101]

---

99 明恥曾指出，在 1930 年代鼓吹「開發西北」的人們，對於當時的西北，有著南轅北轍的懸殊看法：有看成「世外桃源」的，也有看成「人間地獄」的。見明恥，《河西見聞記》，〈自序〉，101。

100 林競，〈自序〉，《西北叢編》（上海：神州國光出版社，1931；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5 影印本），1。

101 林競，〈自序〉，《西北叢編》，3。

同樣的，吳藹宸於慨嘆新疆一地停滯落後、鄙陋頹敗之餘，也將個中癥結歸諸「漢人未盡倡導之責」。他強調，新疆廣闊的水草區域、肥沃之土地與夫蘊蓄至今尚待開發之礦藏，實為該地真正價值之所在；如能擬訂全盤計畫，針對畜牧、墾務與礦產三項，「澈底經營，根本改造」，必能使新疆全境「荒涼偏僻之區」，一變而為「光明燦爛之域」。[102]林鵬俠於遊歷西北後，也一再申言，西北地區資源富饒，非但利於農牧，於國防工業之所需，亦無不具足，其足供民族復興之條件，至完且美，實為中國重要之生命線。今後苟政府能與人民通力合作，集中人才資本，進行大規模實際開發，各盡所能，樹共存共榮之基礎，「則今日群所目為荒原絕域之西北，安知他日不駕巴黎、紐約而上哉？」[103]1933 年，薛桂輪隨黃慕松奉使西北，宣慰新疆，遍歷陝、甘、寧、青、新各地，在記行之作中，更直接將西北地區比作「其富無比，其大莫京」，亟待開發的世外桃源，從而鼓吹抱持「救國救民、利己利人之主義」的國人，「還是到西北去」。[104]一些更為樂觀的旅行者甚至認為，只要適度整理，積極移墾，廣大的西北地區可以輕易容納無以計數的內地過剩人口。李燭塵便曾十分誇張地指出，僅甘肅河西平原一地，即可開發良田二萬萬六千萬畝，足以養活 2,600 萬人。[105]

從以上所引諸般議論，可以看出，1930 年代西北旅行書寫所再現的兩種懸殊異趣的西北意象——「人間地獄」的西北與「世外桃源」的西

102 吳藹宸，《新疆紀遊》，253。

103 林鵬俠，《西北行》，〈自序一〉，2~3；參見林鵬俠，《新疆行》（香港：西北邊疆學會出版社，1951），23~24。

104 薛桂輪，《西北視察日記》（上海：申報館，1934；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重印本），244。

105 李燭塵，《西北歷程》（出版地不詳：文化印書館，1945；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重印本），80。對於這些不切實際的「世外桃源」式虛幻憧憬，翁文灝還曾特意撰文多所譏彈，也可反映出這種樂觀主張流傳之廣、入人之深。翁文灝認為以西北之自然條件，最多僅能移民 1,000 萬人，加以地形雨量種種限制，移民實邊也不是開發西北的有效手段。見翁文灝，〈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獨立評論》4 號（1932 年 6 月 12 日，北平），10；〈如何開發西北〉，《獨立評論》40 號（1933 年 3 月 5 日，北平），2~3。

北，其所構成的，實為一種相反相成的互補關係。「人間地獄」指稱的是西北地區的過去與現況，「世外桃源」則訴求於該地區未來的美麗遠景。不過，此一璀璨遠景，本質上只是一種為黑暗的過去與現在所重重束縛的潛在可能性。西北地區本身並不具備實現這種潛能的力量，惟有經由這群旅行者有意識的介入與佔有（appropriation），「世外桃源」的西北才有可能化為現實的存在。在這樣的論述策略下，西北地區不但是旅行者從事科學考察的知識對象，同時也被建構為如「璞玉素箋」般一片空白，亟待開發利用的殖民客體。而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及其書寫，所扮演的，便是推動此一大規模知識與實踐工程的中介角色。林競、吳藹宸等人於其旅行記述中，明白以張騫、班超、哥倫布諸人相期許；[106]劉文海也把新疆之拓殖開發，比擬於美國之經營加利福尼亞州與英國之殖民澳洲。[107]James Duncan 曾經指出，十九世紀前往非洲探險之歐洲旅行者所書寫的「資訊的或科學的」旅行記述，實與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事業相表裡；其所描述的地理空間，廣袤無垠、富含資源，更是一片杳無「人」迹的「空洞」（empty）空間，因而如何進行有效開發，庶免資源浪費、物棄於地，自然成為歐洲人所應承擔的道義責任。[108]Pratt 也認為，十九世紀歐洲旅行者，把美洲大陸想像成一個洪荒未闢的自然世界，一片未經墾殖、沒有時間與歷史的地理空間；他們的旅行書寫，便是藉由一套積累（accumulation）、豐饒（abundance）與混沌未鑿（innocence）的論述策略，來為歐洲的殖民霸業，提供正當性的基礎。[109]1930 年代中國的西北旅行者，其所關懷的，當然是與前一世紀歐洲旅行者迥然有別的國族主義目標；然而，他們所生產的大量以反帝救亡為指歸的旅行文本，卻極其反諷地承襲了歐洲帝國主義所形塑出的殖民論述。他們也正是在這一套派生的（derivative）殖民論述所構成的知識／權力關係中，來進行他們的國族想像。

106 林競，《西北叢編》，1；吳藹宸，〈自序〉，《新疆紀遊》，7。

107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206。

108 James Duncan, “Sites of Representation,” 50.

109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126.

三、吾土吾民：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疆域的建構

1938 年 10 月，顧頡剛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附屬蒙藏學校演講，報告他前一年於西北甘、青等地考察教育的觀感。在講演的結論部分，顧頡剛極力強調，當前邊疆工作的任務，「要使邊疆的區域逐漸縮小，中原的區域逐漸放大，使得邊疆只成為國界的一線」。[110]

政治地理學者 Richard Muir 對於「邊疆」與「邊界」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有過清楚的界定：

> 邊界位於相毗鄰的兩國領土的交界處，對於決定主權界限及確定其所包含之政治區域的空間形式，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邊界通常被寬鬆地形容為線狀的（linear）；它指的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垂直界面與地表相交叉之處。反之，邊疆則是一個帶狀的（zonal）概念，從而包含著各色各樣的地理特徵與五花八門的人口現象。[111]

簡言之，邊界指的是一條明確界定彼我、本身並無實質內容的線；而邊疆指的則是一塊範圍模糊、廣狹不定的地帶。[112]

如 David Hooson 所言，前近代國家組織並無明確的邊界概念，國與國之間通常是藉由一塊過渡性的甌脫地域，來區隔兩個不同的政治核心。直到十九世紀，隨著國族國家的興起，國與國之間模糊含混的異質性邊疆地帶，才相繼被整合進入不同的國家疆域；國家的政治界線，才被固定化為一條由關卡、防衛武力與護照制度重重管制、嚴密監控的邊界。[113]換言之，近代國族國家所共同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便是如何將原有的「邊疆」——一塊「國家內部的孔隙」（holes in the state），整編

110 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西北史地》1984 年 2 期，16。

111 Richard Muir,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75), 114; cited from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74.

112 J. R. V. Prescott,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London: Croom Helm, 1978); cited from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74.

填補，納入國家的掌控中，轉化為「有效的國族疆域」（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114]顧頡剛所謂要「使得邊疆只成為國界的一線」，所表述的，也正是試圖將西北地區改造成這樣的國族疆域的熱切期望。

其實，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清廷經迭次用兵，陸續戡定北疆準部與南疆回部，將新疆全境納入版圖之後，便曾「分命臣工，乘傳履勘」，參證舊圖，編成《西域圖志》一書，並對西北地區與俄羅斯及境外藩屬的接壤地帶，依山川之阻隔，作過明晰的分界。畫界之時，清廷亦曾三令五申，反覆告誡境外藩屬「不得尺寸擅越」，可見斯時清廷統治者，殆已粗具現代式的「邊界」概念。[115]另一方面，乾隆皇帝於「蕩平」新疆之初，降諭宣示，自伊犁以迄葉爾羌，「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116]官修之《西域圖志》在比較歷代經營西域的成效功業時，也說：「惟我聖朝，德業鴻遠，舉從古未撫之西域全境，井耕其地，而冠裳其民，設官定賦，與赤縣神州相比埒。」[117]在這樣的論述策略下，廣漠無垠的西北邊區，要已被想像為與中國內地「合為一家」的帝國疆域。

然而，在「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以藩屬為屏障」的傳統疆域概念與羈縻政策囿限下，清帝國並未能有效落實對西北邊疆的治理與控制。研究清代邊疆民族史的孫喆便指出，清代於邊疆地區的駐軍與設卡，大多兼具禦外與安內的雙重作用，職能不清、事無專屬，嚴重削弱了其對邊境地區的有效管轄能力。以西北地區而言，清廷於新疆南北各城，置設卡倫，稽查游牧、屯田，禁抑逋逃、盜竊，惟卡倫數目極為稀少，設置之處也都位於距離邊界十分遙遠的地方，其間相隔，少則數百里，

113 David Hooso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6.

114 這兩個概念均取自 Richard Muir, *Political Geography: A New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97)；cited from David Storey, *Territory: The Claiming of Space*, 99.

115 孫喆，《康雍乾時期與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40~148、201。

116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影印本，1968），卷 601，30b。

117 劉統勳等編撰，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卷 3，〈圖考三・歷代西域圖說〉，120。

遠則上千里，因而，帝國的西北邊陲幾近處於全不設防的空虛狀態，與近代國家警備森嚴的邊界，形成截然不同的強烈對比。[118]同時，清廷雖有「同於內地」的宣示，實際上卻將新疆視為罪犯、謫官流徙譴戍的化外之地。如 L. J. Newby 所言，在清代旅行者的筆下，西北地區始終是一片荒寒僻遠，與中國文化價值及規範大相逕庭的異域殊方；西向出塞所必經的嘉峪關，也一貫維持著分判華夷、區隔華夏文明與蠻荒世界的象徵意義。[119]

承襲著如此複雜而曖昧的帝國遺產，1930 年代以「開發西北」的國族主義計畫相標榜的西北旅行者，所共同關懷的一項問題，無疑便是上引顧頡剛所提出的問題：怎樣動員一套有效的領域性策略，將廣大的西北邊疆，整合進中國的國族疆域，轉化為中國這個「地理體」的有機構成部分。

如上所述，這個問題，當然也不是中國國族主義知識分子所獨有的特殊問題，而是任何國族建構過程都無從迴避的普遍問題。十九世紀初，巴黎文士掀起赴外省旅行的風潮，便肇因於他們在大革命後面臨社會崩解的危機意識下，試圖藉由對國族疆域的滲透、調查與測繪，來重新營造一套嶄新的國族認同，以促進法國的凝聚與統一。[120]Robert S. Peckham 也曾指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希臘國族主義運動中的各類文化實踐，所企圖達成的目標，也正是透過空間與歷史的整合，將其新近取得的領土緊密地連結起來。[121]

一般而言，國族主義運動所採取的領域性策略，大約有兩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模式可稱為「自然國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在這種模式的領域性策略下，國族將其歷史、神話、記憶與「國族特質」投射於一塊地理空間或特殊地景之上，從而將國族共同體與其特定疆域

118 孫喆，《康雍乾時期與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236~241。

119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452, 463.

120 Stéphane Gerson, “Parisian Litterateurs, Provincial Journ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72.

121 Robert S.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聯繫在一起，使後者轉化為國族的「家園」。這種使國族疆域「熟悉化」（familiarized）的方式，所強調的面向，乃是國族歷史與文化對土地空間的形塑與印刻（imprint）。相對於此，第二種模式，則可稱為「國族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nation）。這種模式的領域性策略不復標榜文化對自然的馴化作用，轉而頌讚自然本身未經文明雕琢的原始特性，並強調其對文明所發揮的再生功能。在這種觀點中，國族被視為其自然環境的產物，自然也被當作是足以決定國族認同，並賦予其一個整全、同質而統一之形式的偉大力量。簡言之，在第一種模式中，文化形塑了自然；而在第二種模式下，則是自然決定了文化。[122]

這兩種不同模式的領域性策略，也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拒。一個國族可以同時兼採「國族化」與「自然化」的模式，來強化國族群體與其地理疆域的連結紐帶。同樣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國族群體也可能改變其對地理景觀與國族認同之關係的既定看法。[123]要之，國族在建構過程中所採擇的領域策略模式，往往取決於其具體情境與實際需要。

1930 年代中國所遭逢的，乃是日本侵略日亟，領土相繼淪喪的危殆處境。尤有甚者，斯時日本右翼學者更提出「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論述，否定中國對北方邊疆地區的合法主權，以為日本侵略行動提供合理化的藉口。面對如此阢隉局面，前往西北地區旅行考察的國族主義知識分子，苦心焦思、汲汲以求者，除卻積極開發西北地區潛藏的物質資源，俾厚植國力，抗禦外敵的實際目標外，殆莫過於如何闡述西北地區長久以來

---

in Greece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xiii.

122 關於「自然國族化」與「國族自然化」的討論，參見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637-665; Eric Kaufmann, “‘Naturalizing the Nation’: The Rise of Natural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Oct. 1998, London), 666-695.

123 Oliver Zimmer 研究阿爾卑斯山與瑞士國族認同的關係，便將之區分為兩個不同階段：第一個階段（由十八世紀晚期至 1870 年代），是「自然國族化」模式居主導地位的時期，阿爾卑斯山被認為是反映了瑞士國族的本真性特質；第二個階段（由 1870 年代以迄第二次大戰結束），則是「國族自然化」模式得勢的時期，阿爾卑斯山被描述為決定了瑞士「民族性」的主要因素。參見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638.

與中國在歷史、文化上的深厚淵源及緊密連繫，以證成中國國族對於這片疆土的主權正當性。[124]因此，他們所採擇的領域性策略，便不可免地偏向於「自然國族化」的特定模式。

社會學者 Nicos Poulantzas 曾經指出，國族的統一，必須經由「疆域的歷史化與歷史的疆域化」，才能達成。[125]在國族的建構過程中，歷史與地理往往攜手並進，共同發揮著凝聚國族意識的重要作用；而特定的地理空間與地景，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被賦予獨特的文化意義與感情內涵。這種「熟悉化」的文化實踐，在國族試圖將與政治核心相距窎遠、政治控制鞭長莫及的邊陲地域整編納入其支配霸權的範圍時，尤屬不可或缺。十九世紀中期，希臘獨立建國後，其國族主義知識分子相率前往甫行歸附的邊疆地區，從事考古、調查與徵集民俗等諸項活動時，便極力發掘這些地區與古代希臘之光榮過去及革命建國時期之英雄事蹟的牽繫瓜葛，透過過去與現在的時間連續性，來建構出國族疆域的空間連續性。而這些邊遠鄉野之地，也正是在這樣的努力下，被轉化為貯藏著無數國族歷史記憶的文化地景——一個連繫著國族共同體與其地理疆域的國族「家園」。[126]

1930 年代中國的西北旅行書寫，也充斥著類似的敘事模式與修辭策略。幾乎所有的旅行者，在描述其足跡所到之處時，都會加上一段考據性的文字，詳細交代這些地方在中國歷史綿長久遠的時間軸線上的滄桑變化。1935 年，高良佐隨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邵元冲赴陝西祭謁黃陵，並赴甘、青、寧、綏等省視察遊歷，便曾對所經各地的古今沿革一一著墨。他由西安出發入甘，抵達甘肅省會蘭州，在縷述視察參觀的諸般見聞之前，即先行說明蘭州的沿革建置：

---

124 顧頡剛在蒙藏學校所發表的演講中，便對田中義一利用矢野仁一等人所提出之「滿蒙非中國領土論」，發動侵華戰爭，強佔東北一事，大加抨擊，視之為分化中國內部各民族的毒策。見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15。並參見趙守鈺等，〈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總序〉，收入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卷首，2。

125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NLB, 1978), 114.

126 Robert S.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s*, 38-61.

> 蘭州，周初西羌地，秦漢俱為隴西郡，昭帝置金城縣，……唐以後始有蘭州之稱。宋崇甯三年置蘭州路為州治。……明洪武初降州為蘭縣，屬臨洮府，……清乾隆三年移臨洮府治蘭州，置皋蘭縣，為蘭州府治。民國去府存縣，為甘肅省政中樞所在地。甘肅據全國中心，而蘭州又為甘肅中心，秦漢以來河西雄郡，金城為最，蓋地界戎夏之間，繫天下之安危也。[127]

陳賡雅的《西北視察記》，對寧夏的歷史變遷，同樣花費了不少筆墨：

> 寧夏，古雍州地。漢武帝驅逐匈奴，收河南北，立朔方郡，開渠屯田，生聚教訓，遂蔚為西北一大都會。唐建節度使於靈武，經營擘劃，不遺餘力。安祿山叛，肅宗避亂靈武，復定中興之基。……元改寧夏路，明置寧夏衛，清置寧夏道，……民國多因其舊，稱寧夏府，屬於甘肅。至十七年秋，南北統一，國府以甘肅幅員遼闊，劃分甘、寧、青三省，……十八年一月，頒布寧夏建省命令。[128]

至於陝、甘、寧之外，地勢尤屬僻遠的青、新二省，旅行西北的內地知識分子更是窮究文獻，極力鋪陳其與中國歷史的固有聯繫。1927 年，馬鶴天赴青考察，便參證各類史籍地志，對青海西寧地區的沿革遞嬗，論述綦詳：

> 西寧，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漢〕宣帝時，趙充國伐先零諸羌，以其地開屯田，置破羌縣，屬金城郡。……東晉末，西涼禿髮烏孤，據為國都。後魏孝昌二年，置鄯州，……〔唐〕儀鳳二年，置都督府，開元二十一年，置隴右節度使，……宋初屬西夏，後為吐番所據，號青唐城。……崇甯三年收復，建隴右都護府，改鄯州為西甯州，……元至元中，仍曰西寧州，屬甘肅行省。明洪武十九年，改為西甯衛，置陝西行都司。清初因之……民國後，改為道，十五年道廢，改為行政區，所屬有七縣，……監督長官有區行政長及鎮守使，且鎮守使兼青海護軍使，故青海亦為所屬，雖一行政區，

127 高良佐，《西北隨軺記》，168。

128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102。

不啻一省也。[129]

至於吳藹宸、馮有真等人旅遊新疆時，也不憚辭費，對歷代經略這塊「千古神秘之區域」的陳跡故事，多所論列。[130]

1930 年代西北旅行者這種將地理歷史化的書寫策略，並非斯時首創之體例，而是承襲自清代中葉以來西北遊記文本的陳規舊貫。如前所述，嘉、道以降，邊疆史地之學大興，西北地區的建制興革、盛衰變遷之迹，蔚為學士大夫考訂研求的重要對象。流風所被，仕宦謫徙，踐履斯土者，亦莫不於所撰旅行記述中，旁搜博稽，肆力考求所經山川道里、疆域建置的歷史變遷，甚至乃以考據之精粗詳略，作為對是類著作評騭去取的標準。嘉慶年間遣戍伊犁，著有《萬里行程記》的祁韵士（1751~1815），對於當時流傳極廣、影響極大的《西域聞見錄》一書，便做過這樣的批評：「所載不免附會失實，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歷代史乘，皆無考據。」[131]同光名士李慈銘（1830~1894）對於歷來備受稱許的《徐霞客遊記》，也頗著微辭，認為該書於「古今地理，絕未稽求，名蹟留遺，多從忽略，固由明季士大夫不讀書，不知考據為何事也」。[132]反之，其以考據見長如陶葆廉者，則大受時人推重，視之為遊記書寫的圭臬。1891 年，陶葆廉隨侍其父陶模，由天津前赴新疆接任巡撫，載書五車以自隨，於沿途所經州縣名城、古蹟勝景，無不參酌舊籍，追源溯流，考敘沿革，卒成《辛卯侍行記》一書。王樹枏為之作序，揄揚備至，有謂：「其記是書也，獨能於古圖亡滅之後，躬履其地，一一詳究，以求得其一當。其大旨以山為經，以水為緯；以古書之方向里數，定土地之沿革；以方言土音之變轉，證古名之是非。自漢、唐巨儒，訖今鴻學贍才、精研地理之士，凡其言之參差舛牾，不合於古而戾於今者，皆綜覆而析辨

129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30~31。

130 參見吳藹宸，《新疆紀遊》，248~249；馮有真，《新疆視察記》（上海：世界書局，1934），5~7。

131 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引見郭双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78。

132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冊 1，「同治庚午（1870）11 月 23 日條」，473。

之，曠然如迷者之獲康途以逝也。」[133]這些話固不無溢美之處，要可反映當時名宦士夫之西北旅行書寫，殆無不以考訂地理之古今流變為尚。這些努力，當然為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留下了許多足資參照的珍貴遺產；事實上，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記述，便有相當多的內容，直接剿襲自晚清的相關著述。

不過，清代西北旅行者與 1930 年代的知識分子乃是在極為不同的論述形構與關懷目標下，各自從事著將西北地理歷史化的工作。L. J. Newby 認為，十八、十九世紀的西北旅行記述，所以格外注重古今地名的考訂辨析，其用心在於建立西北邊陲與中國內地在歷史上與地理上的連續性；就其政治效應而言，這種「再熟悉化」的過程，也有助於強化清帝國統治的正當性基礎。[134]然而，由上舉陶葆廉的例證可知，當時士大夫的旅行書寫，固然發揮了 Newby 所指出的政治與文化效應，主要卻仍是一種特定學術風氣下的知識展演，也是一種透過細密博贍的考據工夫，獲致士大夫群體之肯定贊許，進而積累個人象徵資本的重要途徑。相形之下，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其所訴求的對象，已擴大而為一般的社會大眾；他們所強調的，也不再只是一套嚴格而精確的知識展演，而毋寧是對一個在歷史的過程中，貫串著過去與現在的中國國族主體的召喚與想像。

我們可以從兩個側面，觀察 1930 年代西北旅行書寫中這種特殊的關懷。

首先，是這些記述中對某些特殊地景描述與再現的模式。如眾所知，在旅行的空間位移過程中，流連勝境、造訪古蹟，賦詩題字、懷古諷今，殆為傳統中國文士屢見不鮮的文化慣行。如 Stephen Owen 所論，這種行為，可謂是一種「記憶的儀式」（rituals of remembrance），其所產生的效應，乃是將個別的文學主體與整個中國傳統所代表的文明社群，結合在

133 王樹枏，〈序〉，收入陶葆廉，《辛卯侍行記》（1897 年原刊；劉滿點校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2。

134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454-455, 464-465.

一起。[135]換言之，這種文化實踐與書寫，所指涉的乃是一個連結著現在、過去與未來的普遍性文明。1906 年，方希孟西行入新，路經六盤山，憑崖四望，雲霧迷濛，乃口占一絕曰：「左揖玉關雲，右把秦隴月；大風走中原，萬里同一色。」詩中所流露的，正是這種普遍性的文化意識。[136]十九世紀初，祁韵士流謫新疆，穿越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嘉峪關時，所感所懷，無非也是與中國文明長相隔絕的淒涼悲切：「紫關龍堆，從茲萬里，關門既出，迴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回首敬望神京，依依欲絕。」[137]

然而，方希孟之後三十年，侯鴻鑑同樣往遊六盤山，同樣賦詩一首，其所寄寓感懷的對象，卻已不復是模糊不定的文明概念，而是中國國族的歷史光榮與未來憧憬：

> 六盤山高七千尺，驅車上下卅九彎；登臨四顧發長嘯，浩氣直欲凌天山。當年華夏聲四震，雄兵十萬獨往還；荒原星落大如斗，歐亞畛域非等閒。迄今四國競馳逐，鷹瞵虎視震大寰；中原豪傑貴自拔，高峰立馬叩刀環。臨風弔古瞻遺墓，史跡千秋人心嵌；我今高踏六盤頂，安得邊隅大啟闢雄關。[138]

1935 年，高良佐也步武祁韵士後塵，登臨嘉峪關。然而，在他的筆下，這同一地景所呈現出的風貌、所召喚出的記憶，卻是「深藏固閉，誠天下第一雄關，令人想見漢武雄風，班侯遠略」。[139]1933 年，張揚明隨軍駐紮西安，往遊慈恩寺，親睹大殿後壁所嵌「黑番投降圖」石刻，其所激發於心者，也是對國族境遇的低徊悲思：「以國際地位低到極點、國

135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引見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 卷 2 期（2003 年 12 月，臺北），14~15。

136 方希孟，《西征續錄》（李正宇、王志鵬點校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104。

137 祁韵士，《萬里行程記》，收入方希孟，《西征續錄》，16。

138 侯鴻鑑，〈車過六盤山有懷成吉思汗〉，《西北漫游記》（無錫：錫成印刷公司，1937），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8 卷，134 冊，36。

139 高良佐，《西北隨軺記》，304。

亡無日的現時擬之，真是『萬國衣冠拜冕旒』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兩種境界了。苟有良心，對此圖、當此日，誰能不傷心涕淚，握拳透爪呢！」[140]

由上引幾個對比性的例證，可以看出，1930 年代西北旅行書寫所建構的，正是一套 Ana Maria Alonso 所指，由特定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所構成的論述策略。[141]經由這套論述策略，西北地區的特殊地景被抽離出其既有的文化意義網絡，重行編入一套以國族為中心的象徵系統；作為一塊地理空間的西北，也因而被轉化為銘刻著國族記憶與神話的「詩意空間」。對 1930 年代旅行西北的知識分子而言，這塊土地所召喚於他的，並不是超拔物外的純粹美學鑑賞，而是中國國族無所不包，充滿著成功與失敗、光榮與恥辱的集體記憶。換言之，正是經由這些旅行書寫的中介，西北地區才密不可分地與中國「歷史」連結在一起，成為表徵國族的「神話地景」（mythscape）。[142]

30 年代旅行書寫中另外一套習見的論述策略，則是透過國族有機體的隱喻，將西北地區表述為中國國族誕生、發展的根源所在。

如眾所知，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對於國族起源（origin）的想像，乃是極為緊要的一環。在國族主義計畫所構築的時間圖式（temporality）中，國族奠基與創生的時刻，便孕育了國族的獨特精神與本真性價值，因而，國族主義者所瞻望的未來、他們對「真實的」國族文化認同的索求、對失落之國族精神的重振，其實乃是對座落於過去之國族根源的重新回歸。[143]在這種意義下，國族所由發祥的地理空間，自亦被視作國族

140 張揚明，《到西北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7 卷，133 冊，239~240。

141 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 (March 1988, Oxford), 39-42.

142 Mythscape 一語，意指一個在時間與空間上高度展延的論述場域，國族的神話即於此場域中不停地被塑造、傳遞與重構。參見 Duncan S. A. Bell, “Mythscapes: Memory, Myth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 (March 2003, London), 63-81.

143 Sakia Sassen, “Spatialities and Temporalities of the Global: Elements for a Theoritization,”

命脈所繫的神聖地域。這樣的地域所構成的，便是 Anthony D. Smith 所謂之歷史的土地，一塊可以為國族成員提供感情寄託與物質保障，值得他們生死相許，乃至不惜性命，捍衛其尺土寸地的國族家園。[144]

當然，西北的陝甘等地，原即是中國上古文明與政治的核心地區，這更為 30 年代的旅行者，提供了有利的憑藉。一如雅典之於現代希臘、羅馬之於現代義大利，西北地區在他們筆下，也被賦予中國國族譜系中開端肇始的神聖意義。邵元冲自述其所以不辭風霜、星軺萬里，從事西北考察之旅的緣由，便說：「西北諸省，為吾華族所自出，古代文化之焜耀于史策，以逮漢唐之文教武功，流風餘烈，罔不炳炳可考。……故于二十四年自春歷秋，周游西北，考其政俗文教、地方特產、關塞險阨、山川形勢，以逮古代史蹟，莫不燦然，益信吾華族之鉅人先德，所以創造經營，以貽我後人者至大。」[145]1935 年，王衍祜率領廣州大學西北考察團赴陝遊歷，也發為如下感想：「陝西為我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即我民族之老家鄉，在中國政治史、文化史上均占有最重要之位置，惜因氣候、交通以及人事種種關係，致昔日文物燦爛之地，今多化為荒涼蒙昧之場。」[146]周振鶴於所撰《青海》一書的前言中，更汲引清末民初盛行一時的「中國民族西來說」的論調，強調青海地區乃是中國國族先祖最早定居開發的故土：「羲皇以上，漢族來自西方湟中一帶；證諸考古發掘，在新石器時代已有居民。其後黃帝且思歸老崑崙之墟，巴顏哈拉山脈即崑崙之正幹也。夏禹去古未遠，其治水也，導河積石，亦青海地也。……祖若宗之來路，弗敢忘也！然則青海之於中國，實居荒古史之第一頁矣。」[147]甚至連對當時甚囂塵上的「開發西北」運動，態度相對

---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cited in Kerem Öktem, “Incorporat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Ethnic ‘Other’: Nationalism and Space in Southeast Turke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4 (2004, Cambridge), 567.

144 Anthony D.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149.

145 邵元冲，〈序〉，收入高良佐，《西北隨軺記》，97。

146 王衍祜，《西北遊記》，52。

147 周振鶴，〈『青海』前言〉，《禹貢半月刊》1 卷 10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北平），29。關於「中國民族西來說」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上的作用，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

保守的翁文灝也認為，新疆地區素為西北要地，「河源玉石，遠古傳流，漢唐各朝，史績尤著」，實非新近歸附的邊遠絕域，而毋寧更是中國國族久已有之的立國奧區。[148]

邵元冲等人有關西北為中國國族發源地的論述，用心所在，自非致力於上古史地的考訂辨析，而是企圖藉由對中國國族光榮過去的追憶，激發時人景慕先祖，黽勉自奮，共禦外侮，收復失土的強烈國族意識。與邵元冲同時膺命謁祭黃陵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便說：「西北為吾民族光榮歷史之所在，吾人不能任其荒棄，必極力作建設之首創，以喚起國人認清中華民族過去確具有光榮偉蹟之精神，俾人人發揮其自信力。基於此種民族之自信力，國家方可永存於世界。……譬如意之墨索里尼、德之希特勒，亦無不以其羅馬或日耳曼之民族精神或偉業，以警惕國人。吾人救亡圖存，更不宜忽略偉大之歷史，並荒棄此民族發祥之地，是誠全體國民所當努力注意者也。」[149]抗戰期間，李孤帆往遊西北，目睹河西地區殘破荒涼的景象，不由發為這樣的感嘆：「河西本為我們的祖先驅逐匈奴，努力開拓的地區，而今竟衰落到如此地〔步〕，我們作子孫的，應該如何奮發，恢復過去的盛況，繼（？）為對得起先民篳路襤褸，慘淡經營的一番苦心。」[150]1942 年，時任贛南督察專員的蔣經國，在其西北行記的最後一段，更以無比感性的語詞，號召有志青年返回中國國族的古老故鄉：

> 西北，你這個偉大而莊嚴的名字！西北，你這個中華民族的古老的故鄉，我們祖先的墳墓，我們祖先留下的燦爛的文化、遺產都在那裏蘊藏著。但是，久違了，中華民族的子孫，已經久違了這祖先的故鄉，遺忘了我們無窮盡的文化寶藏，更遺忘了留在西北的同胞。但是，今天中華民族正處在激變的時代裏，敵人想從四面八方來統

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 期（1997 年 12 月，臺北），36~40。

148 翁文灝，〈序〉，收入黃汲清，《天山之麓》，卷首，1。

149 引見王衍祜，《西北遊記》，26~27。

150 李孤帆，《西行雜記》，249。

> 治我們，為了解救自身的苦處，為了創造今後新的幸福的生活，我們已經自覺起來反抗敵人，自覺地起來從事建國工作。這個時候，我們又記起我們祖先流血流汗的地方，那裏豐腴的物產、堅強淳樸的人民、燦爛的文化，都是我們抗戰建國唯一的力量！今天，我們要建設新的中國，非但要建設新的東南，同時要建設新的西北，為西北的同胞謀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們應當說有志的青年，應當回到我們這古老的故鄉去，有志的青年，應當到西北去。[151]

透過這樣的修辭策略，廣大的西北地區，遂與中國國族過去的歷史以及未來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西北，不但是中國國族久已佔居的固有疆土，更是整個國族賴以創生發軔的原鄉故園；它所召喚的，乃是對國族根源刻骨銘心的追憶與緬懷。因此，1930 年代中國知識階層的西北之旅，就個人外在行跡而言，當然是一段遠離家園、飄泊跋涉的艱苦過程；但是，在國族認同的象徵層面上，卻也正是一段倦遊知返、重回故土的歸鄉之旅。[152]在一片「到西北去」、「回到我們古老的故鄉去」的吶喊聲中，這片廣袤而神秘的土地，終於完成了國族疆域化的漫漫歷程。

然而，1930 年代西北旅行書寫藉由「神話地景」與國族系譜的論述策略，所建構出來的國族疆域，卻並不是一個同質而統一的整體，而是一個充滿著斷裂、矛盾與爭議的場域。文化地理學者一再指出，任何特定的地景，一如書寫文本，都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都可以在不同的解讀方式下，被賦予繁複多樣的意義。[153]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主要是

---

151 蔣經國，《偉大的西北》（重慶：天地出版社，1943），收入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冊 1，228。

152 知名女作家冰心於 1934 年參加平綏鐵路旅行團，赴西北綏、察等地考察遊歷，及返抵北平，下車回家，頓覺「到家反似作客」，恰足透露西北旅行中「離家」與「回家」之間複雜而曖昧的關係。參見冰心，《平綏沿線旅行記》（上海：北新書局，1935；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重印本），276。

153 關於文化地理學者借用文本（text）的概念與隱喻，來研究地景的例證，可參看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Tim Edensor也曾以印度的著名地景泰姬瑪哈陵（Taj Mahal）為例指出，外國觀光客、印度的穆斯林與印度

由漢族知識分子所構成的群體，他們對西北地區這塊地理空間的詮釋，所依據的，基本上是一套以漢族族群歷史為主軸的意義與象徵系統。但是，西北地區並非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一塊「璞玉素箋」、一片空白的無人空間；反之，長久以來，西北始終是多種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雜糅併立、角逐爭勝的「接觸區」（contact zone）。西北的土地與地景，也縱橫交錯地縷刻著多元而紛歧的記憶；其所構成的，毋寧是一幅混亂、無序而深具威脅性的複雜圖像。因而，如何將這些在地的（local）異質空間與時間，有效地奪佔、整編進入一套掌握著支配性霸權、同質而整全的中國國族歷史與國族地理之內，當然是 30 年代的旅行者所不能不面對的重大問題。

四、國族內部的「他者」：西北旅行書寫中的邊疆民族

一如遠赴異國觀光的當代旅遊者，1930 年代由中國內地前往西北的旅行者，往往會在旅途中邂逅許多與其日常經驗大相逕庭的陌生人群與事物。張恨水便曾記述過這樣的親身經歷。1934 年，他路經甘肅省境的華家嶺，驀然碰見一群「頭上紮花布，身上披了大圍巾，還有落腮鬍子」的「印度人」，不由大為驚訝。幾經打聽，才弄明白，這群人並不是外國人，而是甫由土耳其朝聖返鄉的青海纏回。[154]

在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由明確邊界所區畫出的國族疆域，往往被想像成一片同質性的土地。國族邊界以內，任何一塊獨特的區域都只是整個國族疆域的一部分，彼此分享著許多類似的特質，並與國族邊界

教徒等不同人群，對這個地理位址都有著極為不同的詮釋，因而泰姬瑪哈陵也成為各種文化認同相互爭持與協商的場域。See Tim Edensor,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2), 46-47.

154 張恨水，〈西遊小記（十）〉，《旅行雜誌》9 卷 6 期（1935 年 6 月，上海），67。

之外的「他者」，構成鉅大的差異。[155]國族認同，如 Peter Sahlins 所言，便是靠這種分判集體自我及其「他者」的領土或社會邊界來界定。[156]易言之，唯有在以異國的「他們」作為參照對象時，一個社群才可能凝聚成整體性的「我們」。

30 年代西北旅行者同樣也是藉由對「他者」的指認，來建構一套「中國」的國族認同。在他們的筆下，危害中國國族的統一、阻礙西北地區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交通，共同構成一完整「地理體」的，正是一群以外國探險家與傳教士作為具體代表的國族外部的他者。林競於河套一帶旅行，目睹西方基督教會勢力之龐大，便曾大聲疾呼，提醒國人注意其包藏禍心，甘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工具的本質。[157]顧執中往遊青海，在潼關赴西安的長途客車中，發現許多來自英、法、德、土等國，擬赴青海、寧夏與新疆等地旅行的傳教士與探險家，混雜於一般旅客之中。他也認為，這些人無疑「是帝國主義者派來偵察我國內地的密探」，因而痛感，西北地區早已為帝國主義者環伺覬覦，「國人若不奮起去拯救西北，充實邊防，那末九一八式的悲劇，也許將搬到西北來重演！」[158]1936 年，范長江在由歸化城搭車前往百靈廟途中，更直接體驗了這些來自異邦的「他者」，在中國疆域內橫行無忌，反客為主的囂張行徑：「有幾輛掛太陽旗的軍用車隊從我們後面駛來，……開車的『友邦』人士，趾高氣揚的駕著汽車橫衝直撞。我們的汽車得好好的讓他！似乎我們反而是到了外國的客人，我們的客人倒儼然有主人的神氣！」[159]這些無所不在的外來威脅，確實有力地激發了西北旅行者同仇敵愾的強烈國族意識。

不過，從上引張恨水的例證可以看出，30 年代旅行者在西北地區所面對的，並不僅僅是東西帝國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等來自國族外部的他

155 Steven Grosby,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145.

156 Peter Sahlins,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71.

157 林競，《西北叢編》，62。

158 顧執中、陸詒，《到青海去》，35。

159 范長江，《塞上行》，25。

者，更是許多共處於西北邊疆，卻在文化形態、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乃至體貌特徵上，都與這些旅行者所屬的漢人族群，有著重大差異的人群。如前所述，西北地區，自古以來，便是亞洲內陸各類人群征戰貿易、活動往來的天地，即使在十八世紀中葉這塊地域被納入清帝國的版圖之後，始終依舊維持著其多元而複雜的族群與文化面貌。[160]在若干特定地區，漢人族群反而在數量上居於絕對劣勢，根據一項估計，1949 年以前，新疆境內的非漢人群，便多達總人口數的 94%。[161]無怪乎張恨水等對西北狀況極度隔閡的內地漢族知識分子，乍行涉足該地，往往不免感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乃至要用「有點異國情調」的譬喻，來表達其驚訝與新奇的感覺。[162]

借用 Winichakul 的說法，這些「有點異國情調」的人群，其所構成的，正是中國國族「內部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163]或者，更精確

160 概略而言，1930 年代西北的廣大地域，大抵是一個由邊陲性的漢文化、藏傳佛教影響下的藏文化，以及伊斯蘭教支配下的穆斯林文化等三大文化區塊同時並存、交相混雜所構成的高度異質性社會。至其族群結構，則尤為複雜，漢人而外，尚有多達數十種的少數民族，其中人數較眾者，有散居於內蒙草原及新疆北路的蒙古游牧部族、分布於青藏高原東側的藏族、主要聚居於新疆南路的維吾爾族，以及散居西北各地的「華夏穆斯林」（通稱為「回族」或「漢回」）。關於西北地區的文化與族群構成，承蒙本文審查人指正，特此誌謝。

161 Wolfram Eberhard, *China's Minorities: Yesterday and Toda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62; cited from Lisa E. Husmann, "'National U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Davi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53.

162 1934 年參加平綏路局「西北考察團」的孫媛貞於張家口境內初見蒙古駱駝商隊時，便對「他們從頭到腳的裝束」，感到十分「新鮮特別」。見孫媛貞，〈一週間西北旅行記〉，28。「有點異國情調」一語，見薩空了，《從香港到新疆》（香港：民主出版社，1946；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重印本），123。

163 Thongchai Winichakul, "The Others Within". Jonathan Lipman 也曾指出：當代中國人（漢人），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藉由與國內的「他者」，而非國族外部的「他者」的對照，來界定本身的族群與文化認同。見 Jonathan N. Lipman, "*Zhonghua Minzu:* Ethnic Unity and Plurality in Modern China," 1. Louisa Schein 則將中國境內處於地理與認知邊陲的非漢族群，稱作 "internal other"，見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地說，他們乃是中國國族內部的「陌生人」（strangers）：他們既非純然處於國族外部的異己，卻又無法完全納入由漢人族群所構成的核心「我群」。他們所處的，毋寧乃是介乎「歸屬」（belonging）與「不歸屬」（un-belonging）之間模糊而曖昧的位置。[164]他們的存在，顯示了中國國族的實質邊界（literal boundaries）或國族地理體的政治邊界，與象徵邊界（symbolic boundaries）或國族的文化邊界不相疊合的斷裂狀態。[165]

因而，當 30 年代旅行西北的漢族知識分子在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激勵下，致力於建構一個完整而統一的中國國族時，他們所遭遇的一項棘手難題，便是如何因應帝國遺產所帶來的重擔：怎樣將國族邊界之內這些零散而分歧的異質空間，凝聚、轉化為一塊統整而同質的國族空間；怎樣把這些紛賾多樣的獨特在地文化，奪佔、收編進一套穩固而統一的國族文化？簡言之，便是如何透過一套有效的論述策略，重新縫合中國國族的實質邊界與象徵邊界。為此，這些漢族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於其旅行書寫中，投注了大量筆墨，來刻劃他們所見所聞的異質人群與文化。

30 年代西北旅行者首需解決的問題，乃是如何辨識與區分散佈於這塊廣大地域上各式各樣的人群。他們賴以進行族群分類的認知框架，則是一套經由傳統概念與現代科學知識，交互運作，雜糅而成的混雜性知識（hybrid knowledge）系統。一方面，由多元族群所組成的清帝國基於統治的需要，曾長期致力於對帝國邊陲民族群體的識別與命名；其所界定的族群類別與稱號，也往往沿襲至今，與當代中國的民族識別工程有

China," *Modern China* 23:1 (Jan. 1997, Beverly Hills), 73.

164 關於「陌生人」這種既非「我們」，又非「他們」的混雜身分，以及其對既定認知秩序與社會安排所構成的威脅，參見 Michael Pickering, *Stereotyping: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204, 213.

165 關於國族之實質邊界與象徵邊界的區分，參見 Michael Pickering, *Stereotyping: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83. Thongchai Winichakul 則分別稱之為「地理體」（geobody）與「國族性」（nationhood）；他指出：作為一個地理體的泰國，並不等同於泰國國族。泰國境內的少數民族，雖然位居此一地理體之內，但在族群、宗教與意識形態等層面上，卻處於泰國國族的邊緣。見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170.

著密切的歷史連續性。[166]1930 年西北遊記中屢見不鮮的「纏回」、「西番」等族群稱號，適足反映中國固有之族群分類範疇與解釋系統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期以降，在由西方引進的現代民族學知識的形塑下，這些人群也逐漸被建構為具有共同語言、血統、文化特質，並在歷史中延續存在的「民族」。[167]30 年代旅行西北的知識分子，也往往透過「民族」的概念，來辨識、理解與再現西北地區的人群。散居於南疆塔里木盆地周圍諸綠洲，原本僅具高度分化之地域性認同的「纏回」，便是經由這套新興的知識論述，於 1930 年代中期，被轉化成一個整體性的維吾爾民族。[168]就此而言，在近代中國「少數民族」[169]族群生成（ethnogenesis）的複雜政治、文化過程中，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殆不失為其間一個過渡性的片斷（moment）。

透過「民族」概念的引導，1930 年代的旅行書寫中，西北地區的人群，逐漸由舊有籠統而浮泛的稱號，被進一步指認、區分為多個界線分

166 以西南邊區而言，自十七世紀初期以至十九世紀中期的兩百年間，僅貴州境內，由地方官吏根據直接觀察與實地調查，而辨認出的民族群體，便由最初的 13 個，陸續增加到 82 個之多。這些群體所構成的幾個較大的族群範疇，如苗、獞（瑤）、峒（侗）、獞（壯）等，至今仍為中國境內官方正式認定之 55 個「少數民族」的一部分。參見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35-136. 對於清帝國在族群辨認上的成就與影響，當代學者多持正面之評價，James Millward 甚至認為，共產中國的族群政策中，承襲自乾隆皇朝的成分，絕不遜於受諸史達林民族理論的影響，語見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167 關於西方民族學知識在近代中國傳播與發展的過程，參見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1903~1949）（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

168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5; 王柯，《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62。

169 目前常被用來指稱中國境內非漢族群的「少數民族」一辭，乃是 1950 年代中共政權進行大規模民族識別工程後始得確立的族群分類概念與範疇；在 1930 年代的文獻中，則多使用「邊疆民族」一語。因此，本文也依循斯時之語境，儘量保留「邊疆民族」之概念，惟間為行文便利或泛指當代之族群範疇時，則仍沿用「少數民族」一語。作者感謝本文審查人對此二不同概念的提醒。

明，各具特色的族群範疇。嘉慶年間，祁韵士於記述其謫戍經過的《萬里行程記》一書中，偶或分別敘及甘新等地的「番民」、「回民」與「纏頭」等不同人群，卻更常以「番」一名泛指各地的少數族群。[170]及 1938 年，顧頡剛發表其考察西北之感想，則已明白指出，其所行經的甘、青等地，多屬「種族」與宗教最為複雜錯綜的區域，「在種族方面，包括有漢、滿、蒙、回、番、羌、撒拉回及土人等。番人現稱為藏人，撒拉回即新疆的纏頭回」。[171]至若新疆地區民族群體的分類與識別，尤為 1930 年代旅行西北之漢族知識分子共所矚目的重大課題。1916 至 1917 年間，謝彬往遊新疆，已初步辨識出漢、滿、蒙、回、纏、哈（薩克）、布（魯特）、塔（吉克）等 8 個不同民族，「各為禮俗，自成風氣」。[172]其後林競、劉文海、馮有真、吳藹宸、徐弋吾諸人，相繼涉足新境，踵事增華，對於當地複雜的民族構成，也都有過進一步的論述與分類，逮及 1940 年代初期，新疆 14 族的通行說法，遂告確立。1942 年底至 1943 年初，分別前赴新疆考察工礦與地質的李燭塵與黃汲清兩人，便不約而同地指出：新疆號稱有「漢、滿、蒙、回、維（吾爾）、哈、柯（爾別孜，即吉爾吉斯）、錫（伯）、索（倫）、塔塔爾、塔蘭其、塔吉克、烏孜別克」等 14 個不同的民族。[173]對於這些邊疆民族的人數與地域分佈，西北旅行者也努力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族群地圖。[174]易言之，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乃是藉由對民族學知識的挪用，來描述、建構中國國族內部的「他者」；經由這套特定的知識實踐，以往位處帝國邊陲，面目模糊、身分難辨的非漢人群，遂亦漸形具象化，成為一般大眾習而不察、毋庸

170 祁韵士，《萬里行程記》，13、16、19。

171 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13。劉文海也把甘肅境內的民族，區分為漢族、漢回、番族、蒙古族、纏頭回族等數種；馬鶴天則說：「青海民族複雜，有類新疆，除漢人外，有回、有蒙、有藏，並有土民。」分見：劉文海，《西行見聞記》，83；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109。

172 謝彬，《新疆遊記》（上海：中華書局，1925；上海：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影印本，1992），371。

173 李燭塵，《西北歷程》，185；黃汲清，《天山之麓》，19~20。

174 例見林鵬俠，《新疆行》，27~28。

置疑的「社會現實」。[175]1942 年，蔣經國在視察西北途中，特意於酒泉同席邀宴當地漢、蒙、回、藏、哈等各族代表，便高度象徵性地表達了官方權威對這些邊疆民族在中國這個地理體內合法地位的肯認。[176]

民族學知識的介入，同時也改變了漢族知識分子對西北邊疆民族的認知模式與再現策略。L. J. Newby 曾經指出，通貫清代中後期的百餘年間，官紳士夫對於西北地區及其人群的旅行記述，始終是以文／野之分的二元架構，來建構「中國」與華夏邊緣之「四裔蠻夷」的階序性差異秩序。他們往往是以「中國」的文化標誌為準據，來描繪這塊陌生的地域；他們所刻意凸顯的，乃是西北地區及其族群背離「中國」文化既定價值及規範的刻板形象。這些形象，有力地形塑了中國知識階層對西北地區非漢人群的想像與理解。[177]乾隆年間，七十一所撰《西域聞見錄》，便對回民（纏回）不遵禮教、尊卑無序、男女無別的「陋俗」，多所著墨。[178]清末裴景福敘述南疆纏回民俗，也極力渲染其「愚惰不開化」，畏威而不懷德的性習，因而主張強化家父長制的威權統治，推行所謂「強迫愛勞政體」。[179]

---

175 關於近代中國民族學知識與少數民族族群建構之關係，參見王明珂，〈《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導讀〉，收入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14~15、20~21；並可參見何翠萍，〈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收入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357~404。

176 蔣經國，《偉大的西北》，210。

177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452. 關於清代知識分子如何藉由文／野二分的文化觀，建構「中國」與周邊少數民族之文化差異的例證，可參見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新史學》4 卷 3 期（1993 年 9 月，臺北），73~74。

178 七十一，《西域聞見錄》，收入劉際清編，《青照堂叢書本》（道光十五〔1835〕年刊本），〈回疆風土記・風俗〉，93b。

179 裴所謂「強迫愛勞政體」，即「多設農商工官督課之，嚴定規程，勤則獎予之，不及則責罰之，……猶之分財與頑弱子弟，子弟不能理而父兄代理，俟其成立而後授之，此所謂愛勞政體也。」見裴景福，《河海崑崙錄》，143。

這種以漢族文化為中心所構築的文／野二分的文化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支配著 1920 與 30 年代西北旅行者對當地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書寫方式。謝彬在《新疆遊記》中對南疆纏回生活習慣的描述，便幾乎完全承襲了裴景福的敘述模式：「纏民性愚惰，苟給粗糲，即輟業而嬉，不為儲蓄謀，必飢而始耕，寒而始織，薄治田產，求足租稅，免催呼而止。」[180]林競於遊歷西北各地後，對內蒙、新疆、青海這片廣袤地域及其人群的文化風貌，更作了概括性的論斷：

> 膴膴平原，茫茫青野，但見氈廬毳幕，碉居土窟而外，物質文明杳無所有也，……棄詩書而誦哥蘭，蔑倫常而重剃度。世界大勢，茫無所知；共和意義，充耳不聞。宗教之錮習甚深，而文化如是其不進步也。[181]

不過，在上述以漢族文化價值與規範來區判「自我」與「他者」的傳統模式之外，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對於當地的非漢族群及其文化，也逐漸出現了一套不同的論述策略。在這種新的想像之中，這些人群不再只是「棄詩書、蔑倫常」、「野蠻亂暴」的化外頑民，而是在語言文字、生活習慣、風俗宗教上，自具特色，並與漢族迥然有別的不同「民族」。[182]這些「民族」的民風習性，甚至多有優於漢人之處。顧頡剛即自承其一向認為藏民尚保持蠻野之習慣，未受文化之陶冶，及親赴甘、青邊疆藏人地區實地考察，目睹其平民則彬彬有禮，無赤貧之家，其寺廟則精美宏偉，逾於皇宮，其喇嘛則埋頭治學，獻身經典，乃「為之瞿然以驚，惶然以慚」。[183]追隨顧頡剛遊歷西北的王樹民，更明白指陳藏族文化「與中原者異本」，自具其獨特價值，固未可妄加以「無文化」之污名。[184]至於回民（兼含漢回及纏回）與漢人的優劣對比，則尤

180 謝彬，《新疆遊記》，164~165。

181 林競，《西北叢編》，397~398。

182 馮有真，《新疆視察記》，2。

183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卷中，37。

184 王樹民，《隴游日記》，收入中國人民政協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195。

為西北旅行者反覆致意的議題。1931 年赴西北考察地質的楊鍾健便認為，漢人雖在新疆居於統治者的地位，而其民俗習慣，「莫不習于淫侈惡腐」，反倒是被統治的纏民，既無吸煙、纏足之陋習，復注重清潔衛生，反較漢人更多可取之處。[185]顧頡剛對於甘青地區回民「有信仰、無嗜好，身體強健、團結堅固」等諸多優點，也是屢加稱道。[186]范長江根據其親身見聞，更極力強調西北地區民族競爭中，回優漢劣的明顯對比。他指出，寧夏境內回民聚居之地，道路水渠，井然有序，阡陌縱橫，農功畢至，其土地生產量幾達漢人農地的二倍。蓋西北一般漢民，耽溺鴉片，生機斲喪；而當地回民受惠於宗教信仰，不嗜鴉片，因而有著強健的身體、勇敢的精神。為此，范長江甚至提出嚴重的警告：「此種趨勢，如沒有糾正的方法，則西北的將來，漢人只有漸歸於天然淘汰之途」。[187]

這些西北旅行記述文本，所以能擺脫以往對邊疆民族負面刻劃的窠臼，轉而賦予這些異己人群及其文化正面的評價，固然與其作者經由親身經歷與實地觀察所積累的民族誌知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不過，導致這種文化視角與再現模式之變化，最為重要的因素，或許還是這群漢族知識分子對於建構一個強固統一之中國國族的高度關懷。[188]顧頡剛在上舉引文中，於稱道甘青回民之餘，緊接著便說：「如克加以適當之教育，〔回民〕實足為復興中華民族之中堅分子」。[189]李燭塵對於新疆維吾爾族的積極肯認，也是出自同樣的動機：

> 新省人民以維族為最多，有文字、有經典，及其他醫藥等書，且有音樂、有歌舞，其藝術之高明，即文化水準高尚之表現。而身體強健、知衛生，並無他種不良之習慣。是為中華民國民族中一優秀分

185 楊鍾健，《西北的剖面》，295~296。

186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卷上，37。

187 長江，《中國的西北角》，269~270、312。

188 其實，近代中國民族學（或人類學）的起源與發展，便始終與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有著千絲萬縷、難以分梳的糾葛，甚至呈現為一種國族主義的學風。對於這一側面的討論與反省，參見何翠萍，〈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388~391。

189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卷上，37。

子，獎掖扶植，即所以「永保新疆為中國領土」也。[190]

范長江則更進一步，對西北部分少數民族「漢化」的現象，提出反對的意見。他以甘川邊界藏人習染漢族文化，以致同陷於嗜吸鴉片的難拔深淵為鑑，指出，邊疆民族一旦「漢化」，一方面將使漢人再無有力之競爭對手，不能自我奮勵，促進本身體力、智力與政治、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這些民族的固有文明，勢將「因同化而犧牲，不能使之充分發揚，以構成將來新中國文化之一部」。[191]在這樣的論述策略之下，西北地區的非漢民族群體，遂被建構成為一種極其弔詭的社會存在。他們一方面被當作是與中國國族之核心成員——漢族相對立的差異性「他者」，同時卻又是足以使中華民族這項國族概念更為具體、內涵更形豐富的不可或缺的組成分子。[192]

當然，直接激發 30 年代漢族知識分子的國族主義熱情，促使他們汲汲致力於建構這套將西北邊疆民族納進中國國族象徵邊界之內的特定論述者，仍是他們對中國所面臨之深重國族危機，與西北地區特殊形勢的體認與感受。在他們的認知中，1930 年代的西北，實為東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多方覬覦、亟欲染指的對象，其處境之危急，殆將踵武已告淪喪之東北的後塵，從中國的地理體中被分割出去。1933 年追隨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視察新疆的馮有真便認為，新疆為西北邊防重鎮，幅員之廣、寶藏之富，不亞於已失之東北四省，而在俄、英、土等國環伺之下，「危機緊迫，隱憂潛伏，尤遠過當年之東北」。[193]

然而，西北地區遭罹外敵威脅嚴重若斯，內部各族群之間卻因體質容貌、生活禮俗與宗教文化之歧異，加以權力關係之不平等，隔閡日深，嫌隙屢生。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北地區即長期陷入擾攘不安的動盪

190 李燭塵，《西北歷程》，126。

191 長江，《中國的西北角》，53。

192 王明珂，〈《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導讀〉，14；關於當代中國少數民族在漢人眼中，這種既對立又包容的弔詭形象，參見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71.

193 馮有真，〈卷首語——代序〉，《新疆視察記》，1。

局面，族群之間的暴力衝突幾於無日無之，當地少數民族對於中國的認同，至為淡薄，寖假而於民國期間屢次出現族群民族主義的分離運動。1933 年，南疆纏回於喀什組織「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自立政府，驅逐漢人，並宣布與中國脫離關係。[194]1936 年，內蒙德王復於日人支持下，成立自治政府，與國軍血戰於綏東一帶。凡此諸端，在在反映出 30 年代西北地區內外迭乘、土崩魚爛的殷重危機。

對於西北地區族群關係的矛盾與緊張，旅行西北的漢族知識分子，目擊身受，感慨自深。北伐期間，共產黨員宣俠父遄赴塞外，參加西北軍工作。某日，行經回族聚居之山村，向居民乞水解渴，回民懾於兵威，不敢拒絕，但是，一等宣俠父一行離開，他們立刻把盛水的磁碗拋棄。宣俠父事後得知，痛感回漢族群之間鴻溝之深、敵視之烈，幾於無可消弭。[195]劉文海於甘肅隆德境內，更親聞回漢族群相互仇殺，無分老弱，盡行屠戮的慘劇。[196]范長江多次遊歷甘、青、內蒙等地，也屢遭藏、回等少數民族的排拒與抵抗，狼狽困頓，苦不堪言。[197]

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西北地區族群關係所以惡化至此，不能不歸咎於掌握政治權力之漢人，對於異己族群的歧視、壓迫與剝削。顧頡剛便認為，甘肅境內，漢、回（漢回）、藏三族人數相埒，勢均力敵，而種族宗教大相懸殊，本已易生衝突。乃漢人獨居政治之優勢，「往往利用其地位以事奪取」，雙方猜嫌既久，無日不作相斫之醞釀，以致一有發洩機會即生大亂，「西北所以三十年一亂，其故在此」。[198]李燭塵論析新疆的民族問題，也指出，漢族歷來於軍事、政治上佔有優厚之勢力，卻又濫用其勢力，貪污淫暴、役使各族，以致纏回青年離心離德，「其

194 參見紀大椿，《新疆近世史論稿》（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179~180；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28; 當時人對此事的記述，參見吳藹宸，《新疆紀遊》，180~186。

195 宣俠父，《西北遠征記》（上海：北新書局，1931；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重印本），101。

196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28。

197 長江，《中國的西北角》，44、59。

198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卷中，36~37。

獨立運動幾有不可終日之勢」。[199]范長江同樣也把西北地區蒙、藏族群仇視漢人，亟欲脫離中國的普遍心理，視作漢人不合理之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惡果。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川、甘、青等地漢人每以「中原人」自居，鄙視蒙、藏人群，稱之為「韃子」、「番子」，復從政治、軍事與經濟等各方面肆行敲剝與侵略，「民國所謂五族共和者，實空有其名耳」。他強調，當前帝國主義列強爭雄東亞之重心，已集矢於中國，西北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深重矛盾，適足與人以可乘之機；苟不知警覺，改弦更張，則「中國今後民族之大分裂，為期不遠也」。[200]

為了改善西北的民族關係，挽救中國國族迫在眉睫的危亡命運，這些西北旅行者也相率提出尊重少數民族、賦予其平等地位，俾於中華民國的國家架構下，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的看法。林鵬俠於總結其西北之行時便認為，欲開發西北、鞏固國防，「非積極努力全國人民之團結不為功，而尤以解除回漢歷史糾紛為當前之要務」。她指出，西北為回族生活之地域，「吾人至少亦宜尊重其地位，而使之相安」；且回民忠實勤儉，固中國五族中之健者，「果能善為撫綏，施以訓練，則捍患禦侮，寧不能蔚為前驅」？[201]范長江則極力強調，中國國內各民族相互間的共同利害，遠大於彼此間的利益衝突；他說：「我們現在遭受著外來民族嚴重的壓迫，我們有共同的危機，我們需要共同的生存，……我們需要在一種合理的民族關係上來消除內在的衝突，把我們共同的力量，抵抗外來的侵略，以求共同的生存。」因而他大聲疾呼，主張各民族進行平等之政治聯合，經由經濟之自然流通、文化之自然交流，來凝聚西北地區歧異多樣的人群，共同摶鑄成一個鞏固而團結的「中華民族」。[202]

由此可見，上述 1930 年代西北旅行文本中對邊疆民族及其文化的正面再現與肯認，其實並非出自尊重與肯認「文化多樣性」的知識立場與道德信念，而毋寧乃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為因應現實政治需要，所建構

199 李燭塵，《西北歷程》，185。

200 長江，《中國的西北角》，37~39、154~155。

201 林鵬俠，《西北行》，209~210。

202 范長江，《塞上行》，28、38~39。

出的一套新的國族想像方式。在這種新的國族論述中，中國國族的象徵邊界，被極力向外推廓，終至與中國地理體的實質邊界相疊合，從而將作為「異己」的少數族群，整編、收納進入中國國族的範疇。

然而，30 年代的知識分子並不僅以收編、包容差異性他者，建構一個政治性的想像共同體為已足；他們理想中的中國國族，同時還是一個由血緣、族源等根基性紐帶相維繫，並具高度同質性的文化共同體。為此，這些西北旅行者也進行著一項將中國國族的實質邊界向內壓縮，以與國族象徵邊界相契合的反向運動。他們所採取的策略，則是訴諸一套國族化歷史知識的建構，試圖從邈遠的過去，來追尋西北地區諸民族群體與漢族之間在族群起源與歷史發展上的深厚淵源。[203]馬鶴天便以為，所謂中華民族，「實皆同源」，加以數千年間，各族群接觸頻繁，風俗語言相互同化，血統亦因彼此通婚而混融為一，殆已難為明確之分別。[204]他並且以甘邊小鎮唐汪川為例指出，該鎮居民半漢半回，實則共同源自元代四川唐姓漢民，其同祖分支於今猶能分判行輩。由是可知，甘肅的回民與漢人，「大半僅宗教不同，並非民族有別」。[205]劉文海也指出，甘肅漢回雖源自中亞細亞一帶的土雷尼亞族，惟自漢唐以降，已長期同化於漢族，以致今日之回民多與漢人無所區別；換言之，甘肅回族在血統上，乃是一種複雜的混合民族，而與漢族關係最為密切。至於甘青邊界的番（藏）族，雖必未如《書經》所云，為古代「三苗」之後裔，惟番族的容貌特質幾與漢族完全相同，是「二族本出同源，因生活環境之關係，始演成後之別異耳」。[206]黃奮生則更進一步把中國週邊各少數民

203 事實上，近代中國民族學於開創之始，便十分注重從中國歷史典籍來為少數民族溯源的工作。何翠萍便指出，這種學術取向，乃是國族主義學風的產物，它與其說是對異文化的研究，還不如說是對中國本身或中國古代邊疆史的研究。見何翠萍，〈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366~370。

204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第二編，256。

205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第一編，4；並可參見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36。

206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88~89。當時所謂藏族為三苗後裔之說法流傳甚廣，例見張文郁，《拉卜楞視察記》（蘭州：新隴日報社，1935），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族，完全視作炎黃的後裔，與中原漢族「同源同祖」。例如，青海、西康與西藏地區的藏族，追本溯源，實為炎帝之苗裔，其始祖無弋爰劍，乃於戰國時期，由陝西輾轉遷徙此地。下及唐代，復與中國通婚，漢藏兩族更締結為舅甥的姻親關係。只因中國地域遼闊，相距窎遠，交接不繁，遂使「本是同根生」的國族「同胞」，淪於「相聞不相識」的隔閡與疏遠。[207]

30 年代這種「以歷史事實融合國族」的努力，尤為歷史學者顧頡剛所重視。1937 年，顧頡剛在甘邊卓尼對藏族喇嘛演講，即極力指陳藏人與漢人之間歷史血緣的親和性。他認為，西北地區所謂番民、藏民，皆源自古代的羌族，而「羌人與漢人關涉三千餘年，漢人中已有不少羌人血統」；因而，番、藏民族與漢族，在族群起源上，實具極為密切之聯繫。[208]前此一年，他在討論回漢關係的一篇文章中，也從元明以來，回漢之間頻繁融洽的文化交往入手，一再強調回漢兩族，無論在歷史文化上，抑或是種族血緣上，都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回漢民族乃是「混合無間的一家人」，其所以產生隔膜與糾紛，完全是清代二百多年分化愚弄政策所造成的惡果，絕非信仰與生活習慣的差異，致使回人與漢人「在本質上不能接近」。[209]

顧頡剛對歷史連續性與種族同源性的高度強調，最終促使他走上了徹底否定邊疆民族之民族屬性的路向。1938 年，他在報告其考察感想的演講中，便對民國以來所通行的「五族」之說，大加抨擊。他認為，所謂「五族」，原本只是清朝統治下的五部。及漢、滿、蒙、回、藏等五族之名創立以後，遂假窺伺覬覦之外敵以可乘之隙，得以挾五族之名，行其分化中國之毒策。實際上，中國內部並沒有以「種族」為內涵、界線分明的「民族」之別；構成中國的，並非五族，而是三個文化集團：

---

4 輯 8 卷，124 冊，299。

207 黃奮生，〈序〉，收入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第一編，1~2。

208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卷中，13~14。

209 顧頡剛，〈回漢問題和目前應有的工作〉，《禹貢半月刊》7 卷 4 期（1937 年 4 月 16 日，北平），179~180。該文原刊於《獨立評論》227 號（1936 年 11 月 15 日，北平），8~11。

漢文化集團（包含滿文化）、藏文化集團（包含蒙文化）與回文化集團（內含漢回文化）。這三個文化集團，也就是「中華民族」裏面的三種生活方式。他並且進一步以他在甘青等地調查所知，指出：這三種文化集團雖然來源不同，形式各異，卻已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交流混融，而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換句話說，在顧頡剛看來，中國境內的人群，並沒有種族、文化上的本質性差異，他們所共同組成的，毋寧乃是一個同質的國族整體——中華民族。[210]

經由范長江、顧頡剛等人對「中華民族」取徑殊異的論述策略，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他們的西北旅行書寫中，分別建構出兩套不同的國族想像。中國，或是一個由多個異質「民族」平等聯合，所形成的政治共同體；或是一個由血緣與歷史等根基性紐帶，所凝聚而成之同質的文化共同體。

但是，不論是以領土國家為取向的政治國族，抑或是以族源歷史為依歸的文化國族，30年代的西北旅行者，依然不免在他們所建構的中國國族內部，重新複製出一套階序性的差異秩序。

如上所述，許多前赴西北旅行的知識分子在致力辨識與再現當地人群及其文化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揚棄了傳統以漢族文化為中心所構築的文／野二分的文化論述。但是，他們所填補上的，卻是另一種以社會進化論為骨幹，由進步／落後的二元對立範疇所構成的「現代化」論述，從而在中國國族內部，設計出一項更為嚴密有力的教化方案（civilizing project）與一套更具宰制性的權力關係。

在這種「現代化」的論述形構中，中國國族內部各族群，分別被置放在社會進化的不同階段。來自內地都會的漢族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乃是順應世界潮流、符合現代生活需要，進步而理性的普世性知識與文明；反之，西北邊疆民族的文化，則是狹隘、落後而停滯的歷史遺留。徐炳昶認為，新疆纏回所承襲自阿拉伯的文化與宗教，在歷史上固有其優長之處，卻已「是古代的陳迹，並不是現代精確的學問」，遠不足以適應

210 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15。

現代生活。[211]劉文海則指出，甘肅回民的生活，「尚未脫離中世紀時期之情境」，其文化程度，實與現代相差太遠，「所謂新思想、新潮流，多未輸入波及，誠為二十世紀中應傷心之事」。[212]

進化程度較高的回民猶且落後窳劣如斯，則進化程度更遜一籌的蒙、藏族群，自是等諸自鄶，無足稱道。民國初年，周希武赴青海玉樹藏民地區勘界，便把其社會發展階段定位於遊牧與耕稼之間，「其生活甚低，其族制未固，而迷信宗教乃最篤」。[213]林鵬俠同樣認為：「青海蒙番雜處，渾渾噩噩，未脫原始時代色彩」。[214]劉文海穿行內蒙，更對蒙族人民遊牧為生，不適於「優勝劣敗」之「天演公例」的發展前景，深表憂心：「蒙民應知遊牧生活乃落伍生活，居今之世而不思改換、不圖整刷，其民族勢必為天演所淘汰」。[215]

人類學者 Johannes Fabian 曾經指出，人類學知識往往透過將地理空間的差異轉化為時間的差異，來進行對「異己」的建構。在這一套特定的喻說形構中，「人類學知識所指涉的對象，持續而有系統地被置放於一個與人類學知識論述生產者所處之『現在』迥然不同的時間點上」，從而根本否定了兩者的同時共存性（coevalness）。[216]1930 年代旅行西北的漢族知識分子也是利用了同樣的論述機制，來重新確立他們在中國國族內部階序性秩序上的優越地位。他們的旅行書寫，正是一套「時間化」的文化實踐。在這樣的書寫中，西北地區的邊疆民族人群，雖然被移置到一個同質的國族空間之內，卻又同時被擺放於與這些漢族旅行者在進

211 徐炳昶，《徐旭生西遊日記》，冊 1，48~49。

212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112~113。

213 周希武，《玉樹調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重印本），85。

214 林鵬俠，《西北行》，146。馬鶴天與王樹民也都有過類似說法，分見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74；王樹民，《隴游日記》，252。

215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279。黃汲清亦有類似的論述，見黃汲清，《天山之麓》，22~23。

216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1.

化程度上高下有別的不同「文明」層級之中。後者指向的，乃是國族現代性遠景賴以實現、開展的「現在」；而前者所代表的，卻是國族落後、隱晦的「過去」。雙方所共同構成的，則是一個具有同質性、延續性，但在等級上有所區分的國族連續體。[217]

在這種將空間差異時間化的論述實踐下，西北的非漢人群，往往被美學化、浪漫化為體現國族原初本質的表徵，也成為旅行者國族主義鄉愁情懷（nostalgia）投射的對象。林鵬俠對於青海番民嚴守居喪不歌不樂之古制，便是以「禮失而求諸野」的說法大加稱揚。[218]黃汲清也把南疆纏民於初夏採食桑葚，終日偃臥，以致屢受詬病的「惰劣」習性，重新詮釋為「特富詩意」的理想生活方式，即「儒家所謳歌的唐虞郅治之世」，蓋亦無以過之。[219]范長江更將與漢人少有接觸的藏族「生番」女子，表述為未經「文明」污染之「自然」；甚至以為她們自由交往的男女關係，「比漢人之受重重禮教束縛者，要美滿得多」。[220]

然而，另一方面，這些邊疆民族「落後」、「原始」的生存狀態，卻同時也為漢族知識分子藉由「進步」、「現代化」的教育方案，以遂行族群「同化」的國族主義計畫，提供了有力的正當性基礎。[221]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便幾乎無人不把興辦新式教育，當作是解決西北各種問題的重要對策。徐炳昶在指陳新疆纏回的固有文化已是古代陳跡之餘，就極力主張於新疆各地遍設學校，教授「近代精確的學術」。他認為，

217 參見何翠萍，〈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391。

218 林鵬俠，《西北行》，123。

219 黃汲清，《天山之麓》，173。清末以來的新疆旅行書寫，輾轉傳鈔，往往都會述及南疆纏回這項獨特的生活習俗，但是在 1930 年代以前，幾乎所有書寫者都是以之作為凸顯回民「惰劣不開化」的典型例證。參見裴景福，《河海崑崙錄》，143；鄧纘先，《葉迪紀程》（1921 年刻本），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5 卷，121 冊，66；謝彬，《新疆遊記》，178。

220 長江，《中國的西北角》，51、85。

221 Eric J. Leed 討論歐洲帝國主義的旅行書寫，曾指出，歐洲旅行者便是透過將非西方人群的文化差異「時間化」的論述策略，把歐洲對非西方世界的掠奪與剝削，在道德上證成為對後者的「教育」與「啟迪」。See Eric J. Leed,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新疆回民如果還想在現在的時代生活，便不能不進漢人所設學校，學習現代知識，苟如此，「三五十年後，或者可以有相當的同化」。[222]顧頡剛也主張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設置師範講習所，使漢、回、藏諸族群，「以教育相同而達思想相同，因思想相同而情感互通，因情感互通而團結為一體」。[223]而即便是反對「同化」政策最力，主張各民族平等聯合的范長江，也一再呼籲在西北邊疆灌輸科學教育，以減輕宗教毒害，「使邊地民族迎頭趕上近代民族之水準，而為光華燦爛之中華民族作成優秀的成員」。[224]

經由這樣的「教化」論述，西北的非漢族群，雖然被包容、編納進入「中華民族」的邊界之內，卻依然居處於國族的邊陲。他們不能自我表述，只能作為被表述的客體，接受漢族的規訓與指導。[225]劉文海便說：漢民人數遠在滿、回、蒙、藏等邊疆民族之上，智力之發展亦非其他族群所能望其項背，因而，漢族之優越地位，固為理所當然。[226]同時，這些非漢族群既因「愚昧太甚，迷信太深」，不足以「盡地力，開寶藏」，則漢族之移民西北，代為開發，自屬天經地義矣。[227]劉文海論及內蒙地區荒涼落後、地利未闢的殘破景象，便說：

> 今日內蒙古，仍未大改鴻蒙故觀，罕經人工改造，並且徒見其多方摧殘。蓋該地不幸，自有史以來恆為游牧民族交馳地域，游牧民族鮮知建設，……故內蒙古所以滿目荒涼者，即居無定所之人亦不能

---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172.

222 徐炳昶，《徐旭生西遊日記》，冊 1，49。

223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卷中，39。

224 范長江，《塞上行》，21。

225 當然，這些作為「從屬群體」（subaltern group）的西北少數民族，也並不只是被旅行、被凝視、被表述的客體；他們不但有其自己的聲音，同樣也曾在西北各地乃至內地中國進行過旅行與書寫的活動。不過，由於資料限制與語言障礙，本文尚無法對此一重要面向進行探究。

226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278。

227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24、43。

辭其咎焉。[228]

從這樣的觀點推衍闡發，30 年代的旅行書寫中，甚至出現了將西北的開發工作，比擬於日本與美國對北海道與菲律賓的殖民事業。由是而論，193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西北地區所進行的國族之旅，其實同時也是一部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之旅。[229]

五、結語

人類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1908~ ）於其自傳性著作《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一書中，曾經引述過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夏多布里昂（René Chateaubriand, 1768~1848）討論旅行的一段話：

> 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帶的那個世界去。[230]

當代文化地理學者對旅遊活動的研究，也證實了夏多布里昂敏銳的觀察：在旅行時，我們對所處空間的體驗，與其說是由我們所邂逅的事物來擺佈，毋寧更取決於我們所賦予這些事物的意義。換句話說，其實是我們對這些空間所抱持的意圖，以及我們藉以理解這些空間的認知框架，決定了旅行活動的經驗內涵。[231]因而，旅行這種空間位移的活動，必然也是一種文化行為和一種文化體現。[232]

從這種觀點而言，1930 年代中國知識階層所從事的西北旅行及其書

228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272。

229 楊鍾健在其考察地質的旅行記述中，便不經意地指出：新疆名義上雖為中國之一省，而由許多方面看，「實是殖民地性」。見楊鍾健，《西北的剖面》，295。

230 Claude Le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Trans. by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52; 中譯文見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41。

231 Jaakko Suvantola,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Aldershot: Ashgate, 2002), 33.

232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5。

寫，或許應該放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寬廣脈絡中來解讀。

1930 年代，中國面臨著外敵交侵、國土日蹙的深重危機，開發西北、鞏固邊防的急切呼聲應運而興。諸多來自內地各大都會，身分、職業頗有逕庭的知識分子，便是在「救亡圖存」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激勵下，陸續邁上征程，深入這片廣漠無垠的陌生地域考察遊歷。

也正因這種獨特關懷，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自始便展現出與中國固有的旅遊傳統截然不同的風貌。它不再是以自然景物的美學賞鑑為依歸，而是以認識國族疆土、強化國族認同的政治意圖為標的。這樣的旅行活動所生產出的記述文本，因而也成為一套以特定方式來組織與再現地理空間的論述形構——一套領域性的技藝（technology of territoriality）；中國國族，便是經由這套技藝的運作，在空間上被創造出來。[233]

許多研究國族現象與國族主義的學者都曾指出，國族認同通常都與一塊邊界明確的疆域緊密相聯，國族成員也是藉著對國族疆域的分享，而相互凝聚為一整體。我們甚至可以說，國族主義不外乎是一套建構與詮釋社會空間的模式，而國族主義興起的過程中，也深深蘊涵著對「國族疆域」的強烈信念。[234]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正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賴以進行國族疆域想像的一項意識形態機制。簡單地說，這些旅行者，乃是利用一套「自然國族化」的論述策略，來把西北這塊一向位處華夏世界之邊緣，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都與「中國」扞格難容的「殊方絕域」，形塑成為中國國族神聖疆土的組成部分。在他們的旅行記述中，西北一方面被表述為中華民族發祥起源的「故鄉」，一塊列祖列宗世代所居，孕育了國族獨特精神與本真性價值的歷史「家園」；另一方面，他們又把西北地區的特殊地景編納進一套國族化的歷史敘事，將之再現為銘刻著國族記憶與神話，從而將國族的過去與現在具體地連結起來的「神話地景」。經由這樣的論述策略，西北地區，遂由一塊物質性的地理空間，被轉化為中國

233 「領域性技藝」的概念，參見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16.

234 Colin Williams and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cited from Robert S.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 x.

國族成員共同感情與集體認同所寄寓的象徵空間。

不過，1930 年代旅行西北的知識分子，在動員這套領域性策略，來建構近代中國的國族想像時，卻遭遇了一道棘手的難題。如前所述，一個國族的疆域通常都被想像成一塊同質或一致的地理體，並藉由一條明確的邊界而與其他國族相區隔。在這條界線之內的每一塊地域，都有著彼此共通的特質，並共同構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但是，中國的西北地區，長期以來，卻始終是由許多不同的族群與文化混雜交會，所形成的異質空間。易言之，在西北地區，中國國族的實質邊界與其象徵邊界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

為了消弭國族實質邊界與象徵邊界的巨大落差，30 年代知識分子一方面汲引新興的民族學知識，來描述、建構、區分這些國族內部的「他者」；一方面又透過歷史與考古的知識框架，將這些「他者」轉化成與國族核心成員——漢族，在種族與文化上同出一源的「同胞」。

經由這樣的論述，西北地區的異質人群與文化，遂被整編納入一個同質、連續的國族共同體之內，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成員。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代表國族整體發言的，卻是作為旅行主體的漢族知識分子；「被旅行」的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由於「進化」程度的相對低落，則只能是國族教化、規訓的客體。因而，當 193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西北旅行書寫，透過國族主義的領域性策略，將原本只是一個抽象地理概念的西北地區，轉化為群體認同與感情所投注的國族「地方」時，作為形塑當地少數民族人群具體生活經驗的「在地地方」（local place），卻被剝離出本有的文化脈絡，抽象化成為一片普遍而空洞的地理空間。因而，我們從這些旅行書寫所看到的，固然是一個近代中國國族的想像過程，卻同時也是一套在國族內部發揮著拒斥與包容之權力效應的文化殖民過程（internal cultural colonialism）。[235]旅行西北的知識分子，雖然努

235 “internal cultural colonialism”一詞出自 Andrew Higson。對於這個概念的闡述，見 Dave Morley and Kevin Robins, “No Place Like *Heimat*: Images of Home(land) in European Culture,” in Erica Carter, James Donald and Judith Squires ed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3), 9.

力要把承襲自帝國的空間遺產，納入一套嶄新的國族框架，他們所想像出的中國國族，卻依然只能是披著國族外衣的帝國。

*本文初稿惠蒙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教授暨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費神校閱，糾謬攻錯，賜正多端，受益良深，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潘志群　校對：吳立仁　黃俊棋）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地學雜誌》。北京（北平）：中國地學會。
《禹貢半月刊》，北平：禹貢學會。東京：大安書店影印本，1968。
《旅行雜誌》。上海：中國旅行社。
《獨立評論》。北平：獨立評論社。
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劉際清編，《青照堂叢書》本，道光十五（1835）年刊本。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方希孟，《西征續錄》。李正宇、王志鵬點校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王衍祜，《西北遊記》。廣州：清華印務館，1936。
王樹民，《隴游日記》。收入中國人民政協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1962。
冰 心，《平綏沿線旅行記》。上海：北新書局，1935；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重印本。
吳藹宸，《新疆紀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李孤帆，《西行雜記》，出版時地不詳。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9 卷，冊 135。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李燭塵，《西北歷程》。出版地不詳：文化印書館，1945；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重印本。與蔣經國，《偉大的西北》及薛桂輪，《西北視察日記》合刊。
周希武，《玉樹調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1986。
明 駝，《河西見聞記》。上海：中華書局，1934；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9 卷，冊 125。
林 競，《西北叢編》。上海：神州國光出版社，1931；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5 影印本。
林鵬俠，《西北行》。原刊 1936 年，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重印本。
林鵬俠，《新疆行》。香港：西北邊疆學會出版社，1951。
祁韵士，《萬里行程記》。收入方希孟，《西征續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侯鴻鑑，《西北漫游記》。無錫：錫成印刷公司，1937；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8 卷，冊 134。
宣俠父，《西北遠征記》。上海：北新書局，1931；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重印本。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天津：大公報館，1937 九版。
范長江，《塞上行》。長沙：大公報館，1937；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重印本。

茅盾等著，《西北行》。桂林：中國旅行社，1943。
徐炳昶，《徐旭生西遊日記》。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1930。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青海篇》。南京：國民印務局，1936；臺北：南天書局影印本，1987。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上海：中國邊疆學會，1947。
高良佐，《西北隨軺記》。南京：建國月刊社，1936；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3 卷，冊 129。
張文郁，《拉卜楞視察記》。蘭州：新隴日報社，1935；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8 卷，冊 124。
張揚明，《到西北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7 卷，冊 133。
莊澤宣，《隴蜀之游》。上海：中華書局，1937；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7 卷，冊 133。
陳萬里，《西行日記》。北京：樸社，1926；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重印本。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上海：申報館，1936。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6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6。
陶葆廉，《辛卯侍行記》。1897 年原刊。劉滿點校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馮有真，《新疆視察記》。上海：世界書局，1934。
黃汲清，《天山之麓》。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
楊希堯，《青海風土記》。西寧：甘肅西寧區公署印局，1928；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9 卷，冊 125。
楊鍾健，《西北的剖面》。北平：地質圖書館，1932。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1909 年原刊。楊曉靄點校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劉文海，《西行見聞記》。上海：南京書局，1933；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8 卷，冊 124。
劉統勳等編撰，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蔣經國，《偉大的西北》。重慶：天地出版社，1943；收入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
鄧纘先，《葉迪紀程》，1921 年刻本。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5 卷，冊 121。
薛桂輪，《西北視察日記》。上海：申報館，1934；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1。與蔣經國，《偉大的西北》及李燭塵，《西北歷程》合刊。
謝　彬，《新疆遊記》。上海：中華書局，1925；上海：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影印本，1992。
薩空了，《從香港到新疆》。香港：民主出版社，1946；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重印本。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影印本，1968。
顧執中，《西行記》。上海：出版者不詳，1932；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3 輯 35 卷，冊 110。
顧執中、陸詒，《到青海去》。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4 輯 10 卷，冊 126。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無出版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
王桐齡，〈陝西旅行記〉，《地學雜誌》，第 15 年秋期，1924 年 10 月，北京。
孫媛貞，〈一週間西北旅行記〉，《禹貢半月刊》，3 卷 2 期，1935 年 2 月 16 日，北平。
翁文灝，〈如何開發西北〉，《獨立評論》，40 號，1933 年 3 月 5 日，北平。
張恨水，〈西遊小記〉，《旅行雜誌》，8 卷 9 期至 9 卷 7 期，1934 年 9 月 1 日至 1935 年 7 月 1 日，上海。
楊鍾健，〈《剖面的剖面》自序〉，《禹貢半月刊》，7 卷 1-3 合期，1937 年 4 月 1 日，北平。
錢菊林，〈西蘭旅行隨紀〉，《旅行雜誌》，10 卷 4 期，1936 年 4 月，上海。
顧頡剛，〈回漢問題和目前應有的工作〉，《獨立評論》，227 號，1936 年 11 月 15 日，北平。
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1938 年 10 月講於中央政治學校附屬蒙藏學校〉，《西北史地》，1984 年 2 期，蘭州。
魏 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收入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 80，「兵政・塞防上」。後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4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影印本。

二、專書

Claude Levi-Strauss 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
王 柯，《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1903~1949）。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
王淑良、張天來編，《中國旅游史・近現代部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紀大椿，《新疆近世史論稿》。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徐向明，《范長江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郭双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孫 喆，《康雍乾時期與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顧執中，《戰鬥的新聞記者》。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Barnes, Trevor J. and James S. Duncan,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Bennett, Tony.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Borwell, David. and Jessica Evans, eds.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Bourdieu, Pierre.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Carter, Erica. James Donald and Judith Squires, ed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3.

Clark, Steve. 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London: Zed Books, 1992.

Clifford, Nicholas J.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Daniel, Stephen.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Duncan, James. and David Ley, eds. *Place / Culture / Represen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Duncan, James. and Derek Gregory, eds. *Writes of Passage: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Edensor, Tim.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2.

Fabian, Johannes.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Grewal, Inderpal. *Home and Harem: Nation, Gender, Empire, and the Cultures of Trave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uibernau, Montserrat. *Nationalisms: The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Gupta, Dipankar. *Culture, Space and the Nation-State: From Sentiment to Structur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0.

Herb, Guntram H. and David H. Kaplan, eds.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erritory, and Sca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Hooson, David,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Kohn, Hans.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Leed, Eric J.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Levi-Strauss, Claude. *Tristes Tropiques.* trans. by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McEwan, Cheryl. *Gender, Geography and Empire: Victorian Women Travelers in West Africa*. Aldershot: Ashgate, 2000.

Mills, Sara. *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Mitchell, Don.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Morgan, Majorie.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ravel in Victorian Britain.*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Peckham, Robert S.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Greece.*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Pickering, Michael. *Stereotyping: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Porter, Dennis. *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oulantzas, Nicos.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NLB, 1978.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Rudelson, Justin J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ack, Robert D.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ahlins, Peter.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Smith, Anthony D.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orey, David. *Territory: The Claiming of Spac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Suvantola, Jaakko.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Aldershot: Ashgate, 2002.

Weber, Eugen J.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Winichakul, Thongchai.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Withers, Charles W. J.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cotland since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三、論文

王明珂，〈《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導讀〉，收入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何翠萍，〈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收入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 期，1997 年 12 月，臺北。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 卷 2 期，2003 年 12 月，臺北。

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

張　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 期，1989 年 6 月，臺北。

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新史學》，4 卷 3 期，1993 年 9 月，臺北。

Alonso, Ana Maria. “The Effects of Tru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 March 1988, Oxford.

Alonso, Ana Maria “The Politics of Space, Time and Substance: State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1994, Palo Alto, California.

Bell, Duncan S. A. “Mythscapes: Memory, Myth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 March 2003, London.

Connor, Walker. “Homelands in a World of States,”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eds.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Duncan, James. “Sites of Representation: Place, Time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 in James Duncan and David Ley, eds. *Place / Culture / Representation*.

Fritzsche, Sybille C. “Narrating China: Western Travelers in the Middle Kingdom after the Opium War,” Ph. 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Gerson, Stéphane. “Parisian Litterateurs, Provincial Journ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151, May 1996, Oxford.

Grosby, Steven.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2, 1995, Cambridge.

Herb, Guntram 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erritory,” in Guntram H.Herb and David H. Kaplan, eds.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erritory, and Scale.*

Husmann, Lisa E. “‘National U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Davis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ashani-Sabet, Firoozeh. “Picturing the Homelan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r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4:4, 1998, London.

Kaufmann, Eric. “‘Naturalizing the Nation’: The Rise of Natural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Oct. 1998, London.

Lipman, Jonathan N. “*Zhonghua Minzu*: Ethnic Unity and Plurality in Modern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NEGOTIATING THE SCOPE OF CHINESE STUDIES, Santa Barbara, CA, March 13-15, 2000.

Malkki, Liisa H.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in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Morley, Dave, and Kevin Robins, "No Place Like *Heimat*: Images of Home(land) in European Culture," in Erica Carter, James Donald and Judith Squires, ed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3.

Newby, L. J.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Modern China* 25:4, Oct. 1999,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Öktem, Kerem. "Incorporat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Ethnic 'Other': Nationalism and Space in Southeast Turke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4, 2004, Cambridge.

Penrose, Jan. "Nations, States and Homelands: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Nationalist Though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8:3, 2002, Cambridge.

Schein, Louisa.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3:1, Jan. 1997,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Winichakul, Thongchai. "The Others Within: Travel and Ethn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iamese Subjects, 1885-1910," in Andrew Turton ed. *Civility and Savagery: Social Identity in Tai State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0.

Zimmer, Oliv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Alpine Land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wiss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Oct. 1998, London.

Travel Writing and the Imagination of Chinese Nationhood during the 1930s:
A Case Study o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Shen, Sung-chiao*

Abstract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nation, a specific area of geographic space 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a clearly-bounded and closely-guarded "homeland" that constitutes the inalienable common property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with which every member of the nation identifies wholeheartedly. This article uses travel writings on northwest China to undertake a preliminary inquiry on how this important process unfolded during the 1930s.

The text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ere composed at a time when China was facing a serious national crisis due to the threat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Stimulated by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many urban H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trekked to China's northwestern frontier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and bolster national defense." Their published travel writings depict this region as an indivisible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geo-body" through the discursive strategy known as "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was thus represented as the holy place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le its landscape was re-inscribed into the nation's history as a mythscape embodying its people's collective memories. With the help of this "technology of territoriality," the Han Chinese intellectual-travele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task of transforming the spacious land of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into a "symbolic space" for the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Chinese nation.

However, to the diverse ethnic minorities that inhabited in this region,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ir native lands effectively constituted a process of internal cultural colonization. Under the gaze of the metropolitan Han Chinese intellectual－travelers, the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ly to be subjected as objects of discipline and domestication for the greater nationalist project. Thus, the nation imagined through travel writing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was nothing less than an empire disguised as a nation.

Keywords: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of nationhood, national territory, travel writing, northwest China.